

# 來歸朕亦從的我爲 難客答



安得烈 紀德著

林伊文譯

行印館書圖東亞



MG  
K951.2  
10

安得烈·紀德著

爲我的從蘇聯歸來答客難

林伊文譯

亞東圖書館印行



3 1764 4148 7

# 序

紀德此書原名 *Retouches à mon Retour de l'U. R. S. S.*，其中 *retouche* 一

字本是從繪畫方面借用來的字眼，直譯爲「再觸」，有「修飾」之意，凡已成的圖畫加以一番修飾，有污點的地方洗去，模糊的地方畫清楚，顏色太濃的地方使牠淡些，……這種工作就叫做 *retouche*。學西洋畫的人一定知道此字該怎麼譯的。我本來想譯做：對於我的從蘇聯歸來之潤色。但我想「潤色」或其他更適當的繪畫字眼，用在這書名上，在中國是不習慣的，不能給我們一個明確的觀念。因爲在第一段有「我寫這本書爲的回答他們（誠意的批評者）」一句話，我就大膽改譯爲：爲我的從蘇聯歸來答客難。

法國偉大的文學家中，二十年前需有羅曼羅蘭底大英才敢表同情於蘇聯，如今

(2)

也需有紀德同樣的大勇才敢疵議蘇聯，——然而紀德底精神是特別令人欽佩的。

他這書中屢次提到史大林壓迫底下的犧牲者，提到那些整千整萬關在蘇聯集中營裏的「反革命分子」。他說：「倘若我的書能到他們手裏，則他們的無言的感激，對於我，是比真理報底恭維或咒詛重要得多的。」其實關在或曾經關過不是蘇聯的集中營裏的「反革命分子」(！)，讀了他這本書，雖然其中沒有涉及他們的話，也一樣地感激他的。

譯者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爲我的從蘇聯歸來答客難目錄

一	.....	一
二	.....	七
三	.....	一七
四	.....	二五
五	.....	三五
六	.....	四三
七	.....	五一
八	.....	五七
九	.....	六五

(2)

附錄——

旅伴(一).....	七五
(二).....	七九
旅途隨筆摘錄.....	八九
書信與憑證.....	一〇七

# 吉爾曼史料徵集會

我的從蘇聯歸來之出版，給我招來許多辱罵。羅曼羅蘭辱罵我令我難過。我從未會十分愛好他的著作，但至少我很尊敬他的精神人格。我的難過，由於這一點：那些曾經表示其極端偉大的人很少有幾個能保持晚節。我相信，超於混戰之上——書底著者，一定要嚴厲批判年老了的羅曼羅蘭。這個老鷹已經做好了牠的巢；牠休息在那裏。

辱罵的人以外，還有幾個誠意的批評者。我寫這本書爲的回答他們。

(1)

其中，保羅尼贊，他平時却是很聰明的，此次向我提出一個奇異的譴責，說我不該「將蘇聯描寫做一個再不變化的世界。」我不知道他何所見而云然。蘇聯一月

一月地改變，我早說過了。正是這個令我驚嚇。蘇聯底狀況一月一月地變壞。牠漸漸離開了我們所期待於牠所已成就的，——於牠所應成就的。

自然，我佩服你們的有信心，你們的愛（我說這話，不是反語）之堅定；可是同志們，你們仍然是疑慮不安起來了，你們承認罷；你們一天比一天更加惶恐地自問（譬如在莫斯科黨獄之前）：我們的擁護將到甚麼程度為止呢？或遲或早，你們的眼睛將睜開來；一定要睜開的。那時你們這些正直的人將自問：我們怎能把眼睛閉得如此長久呢？\*

而且正直的人最熟悉內情的，并不否認我說的話。他們祇限於尋覓并提出解釋。不錯，是解釋，但同時又是替一種可悲歎的狀態做辯護。因為在他們看來，問題并不僅在於顯示人們如何走到這個地步（這本是很容易瞭解的），而在於說明人



們有理由走到這個地步，或至少從這個地步經過，先到這裏等待更好的情況；他們以爲人們離開社會主義和十月革命理想而走的這一條路，仍然可以達到共產主義的；此外沒有別的道路可走。這點，我是毫不瞭解的，——他們說。

皮相的考察，倉卒的判斷，——人們這樣批評我的書。好像在蘇聯不是初見的外表使我們迷醉的！好像不是更深入進去，眼光遇到更壞的情況！

蟲恰正躲藏在果子底內心深處。但當我告訴你們：這個蘋果生蟲時候，你們却

\*阿，這些正直的人，有多少已經惶恐不安起來了！他們還要更加惶恐下去的，直到最後認識了

錯誤。

「我本是共產主義戰士，蘇維埃公務員，在蘇聯工作了三年以上，在出版方面，在宣傳機關方面，在工廠檢查方面，——我經過了嚴酷的內部鬥爭，經過了有生以來最猛烈的衝突以後，終於得到了與你相同的結論。」魯采爾夫，與蘇維埃俄羅斯告別一書底著者，寫信給我說。

責我沒有看清楚，——或者不愛蘋果。

倘若當初我祇限於讚歎，你們就不會責我皮相了；然而那時候我才應受皮相之責哩！

你們的批評，我都知道；這差不多同我的剛果遊記和從洽德歸來二書所引起的批評一個樣。那時人們反駁我說：

一、我們指出的那些腐敗，乃是特殊現象，不能做出甚麼結論（因為人們不能否認這些腐敗現象）；

二、要尋覓充足理由來讚揚現時狀態，祇消拿來同以前相比，同未佔領前（我應當說：革命前）狀態相比，就夠了；

三、我所悲歎的一切，都有其深刻的存在理由，這是我所不瞭解的，這就是：暫時的不幸，為着更大的幸福。

在那個時候，批評，攻擊，辱罵，都是從右派方面來的。你們却不能說我「不夠資格」，你們左派的人，——當初你們太高興爭奪我的宣言了，當我說的話合於你們的意味，能給你們利用時候。同樣，你們今天也是不會罵我不夠資格的，倘若我是一味稱讚蘇聯，並宣言那裏一切都進行得令人陶醉時候。

調查委員會，在剛果，後來依然證實了我所指出的一切（我所關心的祇有這一個）。同樣，人家給我的豐富的證據，我所能讀到的報告，以及公正的觀察家底記載（他們是偉大的「蘇聯友人」，或者曾經是偉大的「蘇聯友人」，當他們尚未到蘇聯去觀察以前），都來證實我關於蘇聯現狀所說的話，都來加增我的恐懼。

我的剛果遊記底大缺點，使我的證據很薄弱無力的，便是由於：我不能說出證據的來源，不能指出那些應受懲戒的人底名字，他們信任我，告訴了我，或者給我看那些平時不肯給人看而且不能隨我引證的文件。



人家責我將重大的判斷建立在太狹小的基礎之上，責我太倉卒從枝節的事件做出靠不住的結論。他們說，我所舉出的我所觀察來的事實，也許是真的，但那是特殊的現象，并不能證明甚麼。

從我所觀察的，我祇舉出那些最有典型性的（下面我還要舉出若干其他的事實）。我覺得，我的書中若堆滿了報告，數字，統計之類，是沒有用處的；第一因為我抱定一條原則，凡非親見親聞的，我絕不採用；第二因為我不大信任官方底數字；重要的，是因爲這些數字，這些「圖表」（我自己還是研究過的），人們可以在別處找到。

但既然人們要我這樣辦，我就引證一些材料：

(7)

費爾·格列尼耶，約翰·邦士和亞歷山德里教授，——這三個人，我相信，是一道旅行的；還有一百五十九個同伴，同他們一樣，都是「蘇聯友人」。那沒有一點奇怪，倘若這三位原告（被告就是我）提出來的證據是雷同的。他們引證來的數字，爲表明我的錯誤的，都是一個樣；那是人們給予他們，而他們不加審查便接受下來的。

我要來解釋，這些數字是如何與其他證人所供給的不相符合，——這些人一定更多知道內情，在蘇聯工作很久，有時間深入「下層」去，——至於這一百六十二個旅客不過在那裏過路罷了。他們的旅行一共祇有二十天，其中十四天在俄國境內：從八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八日。在這樣少的時間內，他們仍是能見很多的，可是除了人家顯示給他們以外，沒有見到別的甚麼。其中沒有一個人（我說的是我的三個原告）能說俄國話。我希望他們能允許我反過來認爲他們所宣告的話是有點皮相的。

我已經說過了：在法屬赤道非洲旅行時候，凡是「有人作伴」的地方，我都覺得一切差不多是異常美妙的。直到離開總督底汽車，決定單獨步行遊歷時候，我才開始看得清楚，在六個月之內我能夠直接同土人相交接。

啊，不錯，我也曾在蘇聯見到這些模範工廠，這些俱樂部，這些學校，這些文化公園，這些兒童花園，——這些也會令我驚歎的；同格列尼耶，邦士或亞歷山德匪一樣，我也曾樂於受人誘惑去，爲的轉過來誘惑別人。誘惑人和受人誘惑，本是很有趣味的的事情，那麼我希望上面我所指名的人能確信：我之反抗這種誘惑確有重大理由，而我絕非如人們所說是「輕率從事」的。

約翰·邦士底誠意是很可欽佩的；他的信任心，如同孩童底天真，是很感動人的。他承受人家告訴他的話，同以前的我一樣，沒有檢查，沒有懷疑，沒有批

評。

說起他所提出的（或亞歷山德里和格列尼耶所提出的）某些數字，譬如一個工廠底出產罷，我認爲靠不住的，我今摘錄真理報底若干自承，請這些同志默省一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真理報說：

「在第二季當中，野洛斯拉夫工廠出產的汽車附件之總數內（官方統計所得意誇耀的唯有這個數目），有四千件成了廢物，在第三季當中，則有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件不能使用。」

\*至少當他的信任心沒有流入於附會可笑的時候，譬如他寫道：「在會客廳裏……我看見一尊彌涅甫神像，一尊尤比德神像，一尊狄安娜神像。工人們祇加以一種修正，便是添加一尊青銅鑄的列寧半身像。」

彌涅甫神和列寧並列，似乎是不可瞭解的，然而我們看得出二者相接近之處。這就是證明：共產主義乃是好多世紀人類歷史之自然的，變化的和不可避免的歸宿，乃是最高的和最博愛的文化之繼承者。」

（見蘇聯日報第六十六頁）



十二月十四日，提起某些工廠出產的鋼時候，真理報說：

「在二三兩月中，人們淘汰了百分之四·六的金屬物，在九十兩月中，則淘汰了百分之一六·二。」

「怠工，」——人們說。最近幾次大獄好像就是怠工底一種證據（反之，怠工又是大獄底證據）。然而，我們很可以在這些廢物中看出一種人爲的和過分的生產緊張之代價。

計劃固然是很可讚美的，但在現時「文化」程度之下，某種數目的出產非費巨大代價不可。

伊熱夫斯克工廠生產品廢不可用的，在四月至八月這個時期內共值四十一萬六千盧布；但十一月這個月內已經高到十七萬六千盧布。

運輸汽車時常失事，是由於汽車夫過分勞苦，但也是由於車子品質之粗劣；一九三六年檢查的九千九百九十二輛汽車中，有一千九百五十八輛是被認為殘缺不全

的。在一段運輸路上，二十四輛車子中有二十三輛不能行駛；在另一段路上則五十二輛車子中有四十四輛不能行駛。（見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真理報）

照一九三五年計劃所宣布的，五千萬張留聲機片子，一部分即四百萬張應由諾金斯克工廠供給的，但這工廠祇能供給一百九十九萬二千張。可是廢不可用的片子却佔三十萬九千八百張（這個數字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真理報給我們的）。一九三六年第一季中，生產祇有計劃預定的百分之四九·八；第二季中，百分之三二·八；第三季中則僅有百分之二六。

生產既然漸次退減，他方面破損的件數反而日益加增起來：

第一季破損一五六·二〇〇件

第二季破損二五九·四〇〇件

第三季破損六一四·〇〇〇件

第四季底完全統計還未發表，但一定是更不如的，因為十月這個月內已經破損

了六〇七·六〇〇件了！那麼人們試判斷一下，每件可用的生產品究竟費了多少的『成本』。

『勞動英雄』工廠製造，供給莫斯科小學生用的二百萬本練習簿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可使用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新聞報）在洛斯托夫，人們必須丟棄八百萬本練習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真理報）

傢具協作社賣出去的一百五十隻椅子中，有四十六隻一坐就壞了。二千三百四十五隻椅子，有一千三百隻不能用的。（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真理報）外科工具也是如此殘破。布登加教授，蘇聯有名的外科醫生，特別訴苦，關於精細手術所用工具之惡劣品質；外科縫針，在行手術之中，不是彎了，便是斷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真理報）諸如此類。

這些材料應該能使那些喝采的人稍微審慎一下。但宣傳機關是不管這一切的。我們還要指出一點：生產之遲緩和惡劣，本是受人攻擊之對象，有時還引起訴

訟，受法律嚴重制裁，而且若是報紙公布出來的話，那已經是有了相當改良了。

自我批評，在理論和原則問題上是如此難得見的，但在關於已定計劃之實行方面，則充分發揮出來；這是新聞報（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告訴我們：莫斯科有幾區，此時平均六萬五千居民祇擁有一個藥房；其他幾區，則七萬九千居民才擁有一個；全城之內一共祇有一百零二個藥房。

這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新聞報告訴我們的：

「自從取緋墮胎之法令公布以後，莫斯科每個月出生嬰孩達到一萬人，同公布以前時代比較起來要增加百分之六五。生產率既然如此增加，但產科醫院底床舖則祇增加百分之二三。」

育嬰堂和托兒所，常是十分美妙的。但在一九三二年，依照瓦爾脫·西特令爵士所估計，\*能在這裏面找到位置的小孩子，八個之中祇有一個罷了。按照新的計

劃，倘若這計劃能完全實行的話，則此比例數可增加一倍，即八個之中有了二個。那還是不夠的，但有了進步。反之，我恐怕工人住宅問題將每况愈下的。新建築計劃，與需求相差仍是很遠，因為人口增加了。一間房子住三個人的地方，恐怕不久之後要住四個或五個。此外，最近建築給工人居住的好多房屋，是如此倉卒，或寧可說如此輕忽，材料又如此庸劣，恐怕不久就要不能住人的。

這個愁慘的住宅問題，乃是最感動瓦爾脫·西特令爵士的問題之一。他在巴庫附近，不管官方的嚮導如何阻攔，仍然得參觀石油礦工人底宿舍：「我在這裏得見

\*……若是每個小孩都容納進去，必須有二百萬位置才行。然而事實上容納的，八個有資格的小孩中祇有一個。一九三七年時又將怎樣呢，那時希望工人數目達到二千八百萬？就單拿城市托兒所來說罷，那些地方將能容納七十萬小孩，若是大家都進去的話，則應容納一百八十萬小孩。可見每四個小孩中祇有一人能得位置，還須假定這計劃能完全實行哩！」（見瓦爾脫·西特令爵士著的我在蘇聯探求真

幾所污穢房屋底最愁慘的標本，在這國土，這類房屋是不會沒有的，」他說，「其中一切都是不堪入目的。」嚮導告訴他，應當把這看作帝制時代一種殘留物。西特令抗議道：「現在已經不是甚麼百萬翁來開發石油井了。……革命之後十八年，你們還容許你們的勞動者居住在這類豬欄！……難道不是很可怕麼，想起了幾萬個工人十八年來被拋棄在這豬欄裏面？」

伊達，在他的小冊子「俄國革命之墮落」中，也舉出其他數例關於這個可悲歎的問題，他添加幾句話說：「這個住宅危機，乃是起因於革命太忙於「超過資本主義」，太忙於建築巨大的工廠和組織人類從事生產，而忽略了人類底生活。遠遠看去，也許現出偉大的樣子，在近處看來則是非常可悲傷的。」

對於我的從蘇聯歸來之責難，最應領受的一個，便是說我太過於注重文化問題；其他更緊迫的問題尙未曾解決以前，文化問題是可以置諸腦後的。這也是由於當初我認爲必要，將我在蘇聯的幾篇講演附在書後，而這些講演引起了非難。在這樣小一本書內，這幾篇演說佔了太多的位置，引起人注意。此外，這幾篇演說是在我的旅行初期；那個時候我還相信（是的，當時我是這麼天真）：人們在蘇聯可以認真地談起文化并誠懇地討論牠；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社會問題是如何落後，如何受人冷落。

(17)

然而，人們若將我所說的話祇看作一個文學家的要求，那我仍是要抗議的。當我說起精神自由時候，我指的是另一回事。在卑躬屈節之中，科學也是要敗壞的。

某著名科學家被迫去否認他所傳授而不大合於正統的理論。科學學院某會員「承認他以前的錯誤」，這些錯誤學理「能給法西斯利用去」，他自己公開宣布說。（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聞報）確切說，是人家強迫他承認新聞報奉命控告他的話，——新聞報在他的研究中嗅出了「反革命發昏」底有害的氣味。

（見附錄戴尼葉博士底來信）

愛森斯坦被阻止工作。他必須承認他的「錯誤」，自供他做得不對，他準備了兩年業已耗費兩百萬盧布的那張影片，並不適合學理底需求，所以人家有理由禁止牠。

還有司法呢！難道人們以為最近莫斯科和諾伏西伯斯克底大獄使得我惋惜寫過這幾句令你們氣憤的話麼？即說：「我懷疑：今日在其他的國家，即算在希特勒底德國罷，精神能比這裏更少自由，更低頭，更恐懼的（更受恐怖所嚇怕了的）？」



既然——因爲人們不願太輕易鬆手——人們緊緊抓住「已得的成績」：沒有失業，沒有賣淫，婦女與男子平等，恢復人類尊嚴、教育普及……。可是，祇要檢查一下，這類好看的成績，每一樣都要煙消雲散的。

我祇要比較詳細檢討一下教育問題；其他的問題：我們在半途中將有充分機會討論着。

不錯：旅行家在蘇聯遇到好多青年人，渴求智識，渴求文化。再沒有比他們的熱心更能感動人了。於是人們從各方面叫我們去讚歎那些交付於他們使用的文化工具。我們誠心誠意向政府底法令喝采，這法令於一九三六年二月預見「本年度，即一九三六——三七年，將完全肅清文盲，那四百萬不會讀不會寫以及那二百萬不全會讀寫的勞動者，此時皆能知書識字。」然而……

一九三三年已經提起「肅清文盲」的問題了。此種運動之完成，應當恰與十月革命之十週紀念同時（一九二七年），是有「歷史意義」的——人們說。可是，在

一九二四年，魯那查斯基已經談起了那種『大災禍』：能夠開辦的小學尙不滿五萬所，但在革命前舊制度底下却有六萬二千所，那時人口還比革命後少得多哩！

人們既然不斷地要我們拿蘇聯現狀同革命以前相比較，那麼我們就不得不來證明：在許多領域之內，受痛苦的階級之狀況是毫未曾改善的。然而我們還是回到教育問題去罷。

魯那查斯基指出（在一九二四年）：鄉村小學教員薪水常拖欠六個月，有時甚至一文不付。他們的月薪有時還不到十個盧布（！）固然，此時盧布比較值價些。可是，列甯底未亡人克魯卜斯卡牙告訴我們：『麵包貴了，小學教員拿着十至十二個盧布的月薪，買來的麵包還不如四個盧布時候（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以前月薪數額）多哩。』

一九二七年，規定完成肅清文盲工作之年，文盲仍然在着；一九二八年九月二日真理報自己指出：肅清文盲運動『在停頓之中』。

可是，至少，以後有點進步罷？

我們試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新聞報底記載：『自從新學年開始，好多學校報告我們，說學生們底文盲程度令人驚訝。』

在新學校中，不及格學生底比例數特別高，到百分之七五。（都是新聞報底記載）在莫斯科一城中，就有六萬四千學生被迫留級；在列寧格拉者，五萬二千；而且有一萬五千學生必須留級二次。在巴庫，不能及格的俄國學生數目，四萬五千人中有二萬人，土耳其學生數目，則二萬一千人中有七千人。（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巴庫工人）此外好多學生逃學。『在最近三年中，逃學者底數目，在蘇俄底一所技術學校中有八萬人。在卡巴笛諾·巴爾加教育學院，逃學者佔百分之二四；在庶瓦希教育學院中則佔百分之三十。』這報紙添加幾句說：『各教育學院底學生，其文盲程度是高到令人難以爲情的。』

此外，這些學院，在蘇俄境內祇能徵集合格學生百分之五四；在白俄境內的，百分之四二；在達正斯坦境內的，百分之四八；在阿熱拜揚境內的，百分之四〇至六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真理報告訴我們：高爾基地方五千個小孩子簡直沒有進學校。此外，第一學年滿後逃學的學生有五千九百八十四人；第二學年滿後，二千三百六十二人；第三學年滿後，三千十二人。

爲取締逃學起見，有位工人學業預備班主任，想出一種辦法，卽科逃學者每人四百盧布的罰金！（十二月二十三日東方真理報）人家沒有告訴我們，這罰金是分期付款的還是一次付的；一次付，那是難於辦到的，因爲負責償付之家長，其工資每月不過一百至一百五十盧布。

教科書異常欠缺。人們所能使用的又充滿了錯誤。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真理

報很氣憤，看見莫斯科和列寧格拉底國立書局出版一些用不得的教科書。「教育書局」印行一張歐洲地圖，其中愛爾蘭島浸在阿拉爾海裏，蘇格蘭島浸在裏海裏。撒拉托夫城，從伏爾嘉河搬移到北海去。諸如此類。

一張乘法表印在小學生用的練習簿上，人們在表中學得了：八三得一十八，七六得七十二，八六得七十八，五九得四十三等等。（見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真理報）

有名的肅清文盲運動，如此受人稱讚的，延遲至今尚未成功，這也是因為那些不幸的小學教師，那些孤立的勞動者，時常領不到他們的微少薪水之故；爲着生活，他們不得不從事於教書以外的其他工作。三月一日，新聞報，將這不付薪水事情歸咎於官僚們辦事遲緩（或侵吞公款），——在古衣比舍夫一個地方，國家就欠小學教師半百萬盧布以上。在哈爾哥夫地方，則欠至七十二萬四千盧布。……人們要不禁自問：小學教員怎麼還能活在世間呢？文盲尙未肅清以前，是否教師要被入

肅清掉呢？\*

我希望人們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抱着惋惜心情抄錄這些無情的數字。我們祇合來惋惜一種極可悲傷的狀況；可是，倘若你們的盲目或你們的狡獪，要將極可痛心的成績，裝扮做十分美妙來顯示給我們看，那我是提出抗議的。

\*東方真理報一篇論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惋惜地指出：肅清文盲計劃并未造成所希望的結果。在七十萬部分的或完全的文盲中，惟有百分之三十或四十願意來上課；『以此使得肅清文盲費用，每個人攤到八百盧布，而非預算之二十五盧布。』在某城中（哥干城），人們自誇一九三六年底以前，文盲將完全肅清，可是五月間有八千零二十三個文盲，八月間有九千五百六十七個文盲，九月十五日有一萬一千另十四個文盲，十月一日則有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個文盲。（我們希望這城居民是依比例而增加的，由于鄉村人民遷至城裏來，否則就須推論說：從前識字的人變成文盲了。）塔什干大城有六萬文盲，但登記的七百五十七人中，祇有六十八人來上課。旅行家所讚歎的就是這六十八人。

四

你們鋪張太甚，才使得我的信任心，我的欽佩和歡喜，如此深刻而悲哀地降落了。我所非難於蘇聯的，也絕不在於牠沒有得到更好的成績。（現在人們向我解釋說：蘇聯是不能很快得到更好的成績的，我應當明白這點；蘇聯是從我想像不到的更低的基礎上出發的；現在無數工人所過的貧困生活，乃是舊制度下無量數被壓迫者所企慕不到的。我相信人們稍微誇張了一點。）不是的：我特別非難於蘇聯的，乃在於牠騙我們說：那裏的工人地位是足以令人欣羨的。我所非難於我們國內的共產黨人的（呵，我說的不是受欺的同志，而是那些知道的或至少應當知道的同志），乃在於他們無意或有意對工人們說謊，——有意的，即是有政治作用的。

蘇聯工人黏着於其工廠，正如農村勞動者黏着於其集體農場或蘇維埃農場一樣，亦如伊克松黏着於其輪子一樣。但若他爲了某種緣由——因爲他希望別處能稍好一點（能少壞一點）——要掉換工作的話，那他就當心！他就有到處找不到工作的危險。即使沒有掉換城市，祇離開工廠，他也要無屋可居的（他住屋本也不是免費的），他的住所是如此難得，有工作才有租屋之權利。工人離開工作，就要被扣留一大部分的工資；集體農民離開工作，就要失去他的集體化勞動底一切出息。反之，勞動者是不能違抗他調之命令的。他不能自由去留於他所喜歡的地方，於一種愛情或一種友誼召喚他或挽留他的地方。\*

\*「國家有主權支配經濟過程中物質原素，同樣地也以獨裁的態度支配人力原素。勞動者再不能自由出賣他們的勞動力於他們所願賣的地方，也不能照他們的意思出賣了；他們沒有權利在蘇聯境內自由流通（國內護照！）；罷工權被剝奪去，意圖達抗斯塔漢諾夫運動方法者都要受最嚴厲的制裁。」

費相·勞拉：俄國經濟之一瞥（真人雜誌，第三十八號，一九三七年二月）



他若不是黨員，則入黨的同伴要欺壓他。入黨，求黨收容（這不是容易的事，除了有人幫忙之外，還須有完全正統思想和善於卑躬屈節），乃是「成功」底首先而不可缺少的條件。

既經進黨之後，就難得出來\* 而不立刻喪失他的地位，他的位置，以及從前工作所獲得之一切利益，而不受一切人底欺壓和猜忌。因為，你為甚麼離開黨呢，在那裏面是很好的，黨給你許多利益，祇要求你服從一切，再不要有自己的思想？為甚麼要有思想呢（尤其要有自己的思想呢），既然說過了一切都進行得很好的？有自己的思想，這馬上就要成為「反革命份子」。那時就有資格到西伯利亞去了。\*\*\*

有一種絕妙的高陞手段，就是告密。告密使你得到警察底歡心，警察立刻保護

\* 反之却常常為了「清黨」原故而被開除。那時就要走西伯利亞道路了。

\*\* 伊達說得很好：「入黨，就是同時管政權，管祖國和替自己私人利益服務。」完全的調和，而且是幸福攸關的。

你，但同時利用你；因爲人家開始了一次，再沒有甚麼名譽或友誼能夠攔阻的：必須前進。此外，這本是容易調練的事，而當了偵探是無人敢惹的。

在法國，政黨機關報若是要揭發某人陰私時候，那一定是找這人底仇敵來做這個卑鄙工作。在蘇聯則是找這人底最親密的朋友來做的。人們不是請求做，而是責令做。最好的罪證，便是那種愈否認而愈加有力的。這朋友也必須疏遠底人們要陷害而他供給證據的那個人。（要陷害季諾維埃夫，卡門涅夫和斯彌諾夫時，人們就去找他們的過去好友畢亞塔可夫和拉狄克；先敗壞這兩人底名譽，然後也來槍斃他們。）若是拒絕做這卑鄙工作，那麼自己同要救護的朋友，都不免於難了。

結果，人們甚麼都不敢信任。小孩子天真的言辭會葬送你。人們再不敢在小孩子面前說話了。每個人監視着，自己監視着，被人監視着。再沒有一個自由說話的

人了，除非在床上，同自己老婆，倘若認爲老婆是靠得住的話。X開玩笑說：這個原因就夠解釋結婚爲甚麼變成如此常見的了。自由同居，究竟是沒有結婚那樣令人放心的。你試想想看：人們看見十年以前說的話，被人告發出來，也要治罪！一整天，甚至日日，挨過如此不可忍受的束縛之後，得在枕頭上傾吐心腹，這種需要是一日比一日更加迫切了。

爲避免別人告發，最方便的辦法就是先發制人。何況聽到了可疑的話而不立刻報告出來，是要坐牢或充軍的。偵探告密，成爲公民道德一部分。人們從最幼少的時代就習練起，能夠「告密」的孩子是有福的！

要能進入這個波爾塞伏城小天堂之內，一個悔罪的舊時強盜是不夠資格的，還須將同謀的夥伴交出來。給予告密的這個獎賞，本是格別烏辦案的一種手段。

基洛夫暗殺案發生至今，警察還在捏緊他們的羅網。青年們將請願書交付於彌兒·魏發命（當他戰前不久在俄國旅行時候），這事維德拉克很欽佩而且敘述得很動人，但今天是一定辦不到的；同樣，『母親』（高爾基）一部很好的小說中人物）和她的兒子底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隨你的便）活動，在今日也是不可能的；昨日人們到處得到幫忙，贊助，保護，庇藏，今日所得的祇有監視和告密罷了。

改造過的社會階梯，從上至下，最榮顯的就是最有奴隸性的，最卑鄙的，最諂諛的，最下流的。所有那些敢抬起頭來的人，一個個不是被殺死了，便是被充軍了。紅軍\*也許能夠稍微避免一點罷？我們是這樣希望；因為倘若不然，則這些英勇的和值得我們敬愛的人們就祇剩下了一些劊子手，一些投機獲利者和一些犧牲品了。

於是乎蘇維埃工人，若不是在受恩寵的一輩之中，則成爲被迫害的，挨饑寒的，受壓迫的，遭踐踏的可憐人物，再也不敢抗議了，再也不敢高聲訴苦了，——那麼，此時他們再去發明一個上帝，而且在祈禱之中尋覓出路，這難道是奇怪的麼？他們還能向甚麼人類力量呼告呢？……

我們在報紙上讀到，最近一次慶祝聖誕節時，教堂都充滿了人，——這事情是沒有甚麼令我們驚異的。拿「鴉片」來麻醉被欺壓的人。

我剛才發現，在斑鳩籠角上，這斑鳩是從巢上掉下來的，我在這裏（顧維位爾

\*我看見過好多海軍人員（在塞巴斯托普），軍官和普通水兵。他們和平民間以及他們相互間之關係似乎是親密而簡單的，以致我爲之感動。報紙上宣傳一個故事，說我在莫斯科一個大飯館中，看見幾個軍官進來時，全體顧客都站立起來而且很尊敬的行軍禮；——這個謠言造得如此荒謬，我認爲沒有否認之必要。

地方)養着已經有三個月了，——我剛才發現，我餵鳥的麥粒中有兩顆已經發芽了，在最近籠內小水槽地方，槽內的水有時溢出一點到外面來，以此供給這些迷失在籠底和籠邊夾縫內的麥粒以必需的水分；這兩粒麥子忽然(換一句話說，是我忽然看見的)各自伸出一把淡綠色的薄薄的刺刀，已經有四五公分長了。這本來是很自然的，却使我沉落於驚異之中，以致好長久時間我沒有思想其他的事情。這不錯：人們數算麥粒，稱牠們的重量，牠們在那兒，柔順地滾動着，差不多球形的堅硬的和可以翻來覆去的。忽然，你看，這些麥子中的一粒向你證明：牠也是一個活物！於是乎那憑靠在鳥籠橫棍上的管理者大大錯愕起來，——他從未會想到這個事情。

然而某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在我看來，似乎很奇怪地缺乏這種幽默，能夠使麥粒柔軟以至於生芽。固然，這裏是無所用其感情的：凡應由正義解決的事情，就不當求助於慈悲心。憐憫貧困，為貧困而流淚，這就是支持而非阻止貧困。(此

外，革命所需要的火藥，也不應當弄潮濕的。）

人們所稱爲「心」的那個事物，因爲沒有用場而註定要「枯萎」\* \*了。由此生出某種「無情」，有點太過於輕易學得的「無情」：某種因普遍大改善（或期待普遍大改善）而產出的特有的貧乏。……這種觀察將使我牽涉太遠了；我保留着。

\*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全部著作表現一種異乎尋常的寬洪大度，但尤其表現一種迫切的正義要求。

\* \* 這字眼，我是從馬克思主義字彙中借用來的，同列寧一樣，他說道（見國家與革命）：「國家

枯萎」這個動詞下得非常得當，因爲一方面可以表示過程之緩慢，他方面又可以表示其自發性。」（見

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五一五頁）





## 五

費蘭·格列尼耶先生徵引從蘇聯歸來書中我的幾句話而加以讚許；我在那裏說：「至少，這點是得到了的：在蘇聯再沒有爲若干個人利益而剝削大多數人的事情了。這是偉大的。」於是，格列尼耶添加一句說：「不錯，同志們，這是偉大的！」以此得到聽衆底拍掌。

不錯，這是偉大的。這曾經是偉大的。但這話業已不恰切了。我注重這一點，因爲這是重要之點。伊逢說得很對：「資本主義消滅之後，勞動者並不一定就得到解放。」法國無產者須得明白此理。或者恰切點說：法國無產者能明白此理也是好的。至於蘇聯無產者，則他們已開始喪失了那個終能爲自己勞動而以此獲得尊嚴之幻想了。無疑，再沒有甚麼資本家股東來剝削他們的勞動了。然而他們仍是受剝削

的，而且在一種如此狡猾，如此巧妙和如此隱秘的方式之下受人剝削，以至於他們不知道應當歸咎於甚麼人。這是他們的工資不充足才使得別人能有非分的工資。并非他們得到自己勞動利益，得到自己的『剩餘勞動』底利益，而是那些受恩寵者，那些『有見識的人』，那些脅肩諂笑之徒，那些腦滿腸肥之輩。就是靠着這個以及從這種微少工資上抽來的捐稅，人們才能支付那些一萬盧布以上的大月薪。

爲徵信起見，我抄錄伊達所造的一張表。\* 沒有人敢來否認表中所載的數字：

極端工資

普通工資

工人

從七十至四百盧布

從一百二十五至二百盧布

小雇員

從八十至二百五盧布

從一百三十至一百八十盧布

女傭（家庭雇的）

從五十至六十盧布

（顯然是供膳宿的）

中等雇員及技術人才

從三百至八百盧布

大負責人，大專門家，  
高等官吏，某些教授，  
藝術家 and 文學作家

從一千五百至一萬盧布  
以上，有人舉出某些人  
每月收入到二三萬盧布

養老金底比較表也是很有意義的：

工人養老金：每月從二十五到八十盧布，沒有甚麼特權。

高等官吏和大專門家底寡婦底養老金：每月從二百五十至一千盧布，此外還有別墅或住宅供其終身使用，又有兒女底教育經費，甚至孫子孫女底教育經費。

以後還有工資扣存底數目（每月工資在一百五十盧布以下者，一部分豁免）——大約扣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一。我不能夠徵引那整章書，但那整本小冊子是值得一讀的。

\*見伊達著的俄國革命之墮落。

一天五個盧布工資；有時還少些。我試拿來比較一下法國工人工資，甚至於失業救濟金。麵包，不錯，比法國便宜些（一九三六年，黑麵包一公斤價〇·八五盧布，白麵包一公斤價一·七〇盧布），但最普通的衣服，最必需的物品，則昂貴得很。盧布底購買力稍稍不及『整理』前我們的佛郎。\* 請你們不要太誇耀工人在工資以外所能享受到的種種利益罷；最常見的是工資愈大，享受的利益愈多。

人們自問：工業製造品，甚至於農業生產品（牛乳，奶油，雞蛋，肉類等），價錢爲甚麼這樣貴呢，國家既然是賣主？但在商品數量尙未充足，而供給遠少於需求之時，使需求的人稍微灰心一下，也并不是壞事。商品祇給那些能付高價的人購買的。惟有大多數羣衆受物品缺乏之痛苦。

這大多數羣衆也許會不贊成現行制度，所以重要的是不讓他們說話。\* \*

約翰·邦士先生看見平均工資漸次增加時，\* \* \* 十分歡喜：

一九三四年：一八〇盧布（平均工資）

一九三五年：二六〇盧布（平均工資）

一九三六年：三六〇盧布（平均工資）

我請他注意一點，就是普通工人小工資仍是照舊，這「平均」工資所增加的乃是由

\* 在一九三六年，每月平均工資能購買二五公斤黑麵包。在一九一四年，工人每月平均能得三十盧布，照當時購買力計算，這個數目却能買六〇〇公斤黑麵包。

\*\* 所以才有近來幾次可怕的大壓迫。然而幾年前史大林自己說過：「二者必有其一：不是我們放棄了樂觀主義和官僚方法，而讓非黨的工人和農民，因我們的錯誤而受苦的，來批評，恆是羣衆怨望漸漸增加起來，終有一天用暴動手段來批評我們。」（摘錄史大林一篇演說，見蘇瓦林史大林傳第三五〇頁所徵引的。）

\*\*\* 弗里曼努力將斯塔漢諾夫運動說做增加工資的一種巧妙手段。我恐怕應當將這運動看做是向普通工人要求更高的生產之一種手段哩！

於愛恩羅者人數和他們的工資增加之原故。

何況，在盧布購買力減退和一般生活費用提高之下，這平均工資其實是未曾增加的。\*

於是乎發生這種離奇事情：每日五盧布或更少些的工資，使得大多數勞動者陷於差不多極端貧困地位，祇爲的讓某些特權分子能支領更大的薪水；\* 并爲的津貼加緊宣傳費用，使外國工人相信俄國工人是幸福的。我們應希望少知道一點俄國工人幸福，爲的讓他們少受一點痛苦。

\*官方的統計表告訴我們：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重工業工人全部工資增加百分之五二；但在同時期中，官吏底薪俸增加百分之九四·八，商業雇員底薪水增加百分之二〇三·三。此外，由於盧布購買力之減退，這種增加工資絕未含有增加生活舒適之意！

\*\*這裏并不是提出工人應享受他的全部勞動生產品問題，無論馬克思或恩格斯都沒有這個主張。

一部分底『剩餘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使得其他少數人們能偷懶，由此形成階級對抗。這個剩餘勞動，馬克思說，『是不會取消的』。（馬克思由此指示出：工人不應希望以自己勞動全部爲個人底享受。）

他說：『剩餘勞動中，一部分是要用來預防意外事變，用來……等等。』所列舉的一定是不完全的。應該加進去某種蓄積，除了維持機器之外，還要『養成一批爲新進步服務之分子。』我們再加上一項：『養紅軍，既然未曾社會主義化的鄰國迫得我們這樣做（而這是『一國社會主義化』之必然的現象）。這點，我想，馬克思一定容許的。但他要感覺荒唐的，即是：大多數人底剩餘勞動使得其他的人能支領過剩的工資。人們便如此走向形成一個特權階級，而絕非走向那『減縮那用於物質勞動的時間』的。

（資本論第十四章）





## 六

沒有感覺到受人剝削，這是偉大的。然而明白現在還是受人剝削，不過不知道受甚麼人剝削，不知道自己的貧困應歸咎於甚麼人，應反對甚麼人！……我恐怕色林底意見是對的，他認為這糊裏糊塗的痛苦狀態，乃是最大的恐怖。他很有力地說：

「在我們這裏，人們還可以尋尋開心！人們不必勉強誇口！人們還是「被壓迫者」！人們還可以將命運所折磨的一切記在那些吸血鬼底賬上！記在「剝削者」蠅子底賬上！此外還可裝做老粗底樣子，無知無識的！……但到了連破壞底權利都沒有時候，怎麼辦呢？到了人們連喘氣都不能的時候，怎麼辦呢？那種生活就變成不可忍受的了！……」（吾之罪）

聽：

今天早晨（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X很得意的樣子，拿來昨晚的時報讀給我

「在兩次五年計劃期間，烏克蘭底預算增加了七倍以上。\*新預算支出方面最大部分是用於社會和文化事業的，其中二·五六百萬盧布用於教育，一·二二七百萬盧布用於公衆衛生。」——喂，你對這段新聞有甚麼意見呢？

打開了路易·費雪兒底書——這書本是很恭維蘇聯的——在第一九六頁上，我讀了一段回答X：

「我有一種印象，覺得佔統治地位的無產階級正在對競爭者讓步了，因為在建築中的十六個新療養院（在啓士洛伏斯克，「世界上最大的溫泉浴場」）差不多都是由政府機關建築的，譬如國家銀行，重工業委員會，郵電委員會，真理報館等等。所有這些機關都雇用了工人；但我想其中官吏比工人更容易獲得舖位和浴場

\*這并不引起小工資之增加。這是犧牲小工資的工人，來構成這「積累基金」的。

罷。」

路易·費雪兒是很可愛的，當他說起「工會底顛頂」時候。聽他的話，似乎工會祇要願意，就能夠阻止「政府官吏，工程師以及其他佔據要津的人，去霸佔最好的房間，去奪取療養院內他們應分的以外的東西……」，不，不；在官僚分子統治之處，工會是沒有力量的。無產階級專政，——人家告訴我們。我們漸漸地離此愈遠了。漸漸地成了「官僚分子對於無產階級之專政」。\*\*\*

\*路易·費雪兒關於蘇聯的書是很有趣味的，非常有利於蘇聯，然而暗藏着批評，善讀者可以看得出來的。

他關於高加索某些小邦之可愛的描寫，使人想起蘇維埃大樹底枝條還是翠綠的；腐化的乃是主幹本身。

\*\*其實，工會同蘇維埃一樣，已經停止存在了（在一九二四年）。工人們得不到這個滾動機關底

因為無產階級甚至沒有可能選舉一個代表來保護他們的被侵犯的利益了。人民選舉，無論公開的或秘密的，都是一種玩笑，一種騙局：從上至下都是委派的。人民祇有權利選舉那預先指定的人。無產階級受人玩弄。他們被人家堵塞了嘴巴，綑了手足，差不多絲毫不能反抗。啊，史大林這盤棋下得好，贏得好，得到全世界共產黨人底大喝采，他們至今還相信，而且將有好久相信：至少在蘇聯，他們已經獲得勝利；他們將那些不喝采的人認做仇敵和叛徒。

官僚分子自從新經濟政策結束之後勢力大大加強了，鑽進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裏面去。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真理報調查之後，估量：農業機器站（舉此爲例）人員中，沒有作用的雇員佔全體百分之十四。\*

保護或援助，這個機關操在一羣約二萬五千個官吏手裏，嚴格隸屬於黨部。——（蘇瓦林著的史大林傳第

這些官僚分子，起初作為管理工具，後來作為統治工具，而產生出來的，史大林自身就是他們的奴隸，——有些人這樣說。再沒有甚麼事情比遣散一些沒有個人能力白耗公費的閒員更困難了。鄂終涅啓宰在一九二九年就已驚訝於「這一大批的飯桶」，他們不願意知道甚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他們祇為阻止社會主義之成功而工作。『沒有方法對付又沒有事情需要的那些人，就安插在監察委員會裏頭。』

——他說。但這些人愈加無能，史大林就更可以倚靠他們的附和主義的忠誠；因為他們的特權地位是祇依靠恩寵得來的。不用說，他們都是現行制度之熱烈的擁護者。替史大林底幸運服務，同時就是保護了自己的利益。

列寧的防止官吏變成官僚，而提出的不可缺少的三條件：第一，可以隨時罷免

\*官僚分子所應費的款項，在戰前，佔全國收入百分之八·五；在一九二七年則為百分之一九·最近幾年的估計，我尚未見。

和選舉；第二，薪俸與普通工人工資相等；第三，人人參加監察，使得——他堅持這點——大家暫時都是官吏，而沒有一人能變成「官僚」。這三個條件，沒有一條履行過。

從蘇聯回來後，人們重讀列寧那本國家與革命小書，就非痛心不可。因為今天，在蘇聯，人們是比昨天離得更遠了，我不僅說是離開夢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而且說是離開那個能走到社會主義的中間階段。

在列寧那本小書內，我們還讀到如下一段：

「考茨基底話總括起來是：祇要有選出的雇員，就有官吏；可見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仍舊有官僚政治的！這話再錯誤沒有了。馬克思拿巴黎公社做例，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執行公務的人，就不成其為「官僚」，不成其為「官吏」了，這是要看人們於選舉之外還設立隨時罷免制，要看人們將薪俸縮減到一個工人底普通工

資，要看人們拿勞動機關來代替議會機關，即製定法律并執行之。」\*

於是乎人們自問：考茨基今日是否要反唇相稽呢？考茨基和列寧兩人中，史大林究竟要監禁或槍斃那一個呢？

\*『工人革命之第一階段，乃是無產階級之構成爲（高陞爲）統治階級，乃是民主政治之勝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有名宣言中說。『民主政治之勝利』——不錯，但民主政治並沒有戰勝人，而是被人戰勝了。』





新憲法中有好多處表示牠立意來預先回答人家底批評，來閃避那些輻心裏明白是應得的攻擊。當權的人完全明白政治機構底指導權已經離開民衆之手；明白民衆和那自稱爲代表民衆的人中，已經斷絕了一切真實的聯繫。這正是他們所要的。所以更加需要使人相信：這種聯繫將是最密切的，「羣衆對於蘇維埃機關之監督將更加強，蘇維埃機關亦將更能對羣衆負責，」如三月十三日人道報所說的。人道報還加幾句話說：「新選舉制將鞏固那被民衆選舉的人與選舉者羣衆之聯繫。」不錯！好得很，那篇論文接着也能不掩飾人們的意圖，即人們要來「指導選舉，要來批評那些惡劣的候補人，不等待他在無記名投票失敗之時，就先出來反對他們。」這種聰明的預見確是值得欽佩的。你試想想，重覆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之錯誤，是

如何令人不快！那日給了民衆可能機會，選舉出（譬如在基輔地方委員會全體會議上）『一些本黨仇敵，今日才揭穿假面的』。由此可見必須迅速於選舉以前『撲滅一切足以妨害黨底活動核心之發展的』。完成此工作，然後選舉才能是『自由』的。

我害怕某報編輯要受處罰的，牠——我不說明何報，怕得陷害了牠——雖然完全盡忠於史大林底蘇聯和新憲法，却敢在讚美之中提出這個畏意的責難（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們恰恰害怕，在現行制度之下，國家機關會不與勞動者羣衆相合一，如在當初蘇維埃制度之下一樣，却反而傾向於離開羣衆。

『——爲甚麼？……』

『——正是因爲選舉人中間有距離，選舉人和他們的代表中間也有距離。』

這個不謹慎的批評還敢提醒這件事：『最近的統計表示六十個公民中平均會有一個在某級蘇維埃當代表，』而『這蘇維埃，無論怎麼樣，當初總是金字塔中一塊石頭，而能施影響於國家政治的。』然而恰恰是這個成了眼中釘呵。恰恰是這個必

須整頓一下：「下層的常設的政治細胞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我們不能完全贊同瓦爾脫，西特伯爵士底宣言，他說他「確信蘇聯，同其他獨裁制國家一樣，是少數一羣人統治着，廣大民衆對於國政完全無分，\* \* 或祇有很小參與一部分。」

歸根到底，都是人民付錢，卽令是間接的。這個方式或那個方式，——由於將民衆最大需要的糧食輸出國外，或使農產品底價格與同此物品付於消費的價格相差

\*我絕不相信甚麼最大多數人底最大智慧；但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容許這最大多數人受痛苦時候  
臨使人聽到他們的訴苦聲音，而且代他們說話的人，人們也願意留心聽他。

\*西特令原文是「自今以前完全無分」；但他在一九三五年說的這句話，現在新憲法實行之後，他  
仍可以重說的，而且更有把握來說的。

甚遠，或由於直接徵稅，——總而言之，都是犧牲工農階級利益，犧牲他們的消費黃金，以構成必需的而且不斷欠缺的積累基金的。從第一次五年計劃以來就是這樣了，以後仍是這樣。這個積累基金，除了應供推動全部機器之用以外，還做些實際的，有用的，慈善的事業，那還是可以原諒的。醫院，療養院，文化機關等等，人們還相信，民衆蒙受其益，或希望民衆將蒙受其益。然而在這樣的窘迫時候，這個積累基金却拿來建築一座「蘇維埃宮」（已故的蘇維埃之宮），使得約翰·邦士同志大爲驚愕。你試想想！一個四百十五公尺高的建築物（他說：「紐約人要相形見絀的。」），頂上安着一尊七十公尺至八十公尺的列寧像，用不銹之鋼鑄的，像底一個指頭就長十公尺。<sup>\*</sup> 好呵，那時至少工人可以知道：他們爲甚麼事情餓死的。他們還能這樣想：這是值得的。雖然沒有麵包，却有可供誇耀的東西。（拿這來誇

<sup>\*</sup>我們絕不敢懷疑約翰·邦士所徵引的數字，此處所說的尤其不敢懷疑。但一尊七十至八十公尺高的像，有十公尺長的指頭？……至少我們希望，列寧是坐著的。

耀的，也許是其他的人。）而最可欽佩的，將來人們還要叫工人投票贊成這宮殿，你看罷；而且還是一致贊成哩！人們將問他們，俄羅斯民衆：是生活更舒適些好呢，還是宮殿好呢？於是乎沒有一個人不回答，不得不回答：還是宮殿好。

「我看見首都一座宮殿建築起來，我就覺得看見全國居室淪爲破屋了，」盧梭說過這話。（見民約論三卷，十三章）蘇維埃工人底居室「淪爲破屋」麼？呵，謝謝史大林！他們現在還是住在豬欄裏頭哩。

這一切，我在蘇聯旅行時候，還不知道，正如我在剛果旅行時候不知道那些大專利公司底作用一般。這裏同那裏一樣，我看出了那些悲慘的事實，却還不能澈底明白其原因。到了寫完我的關於蘇聯的書之後，我才研究清楚。西特令，托洛斯基，麥西耶，伊逢，維多，綏奇，列格，魯朵爾夫以及好多其他的人，供給我以他們的證據。他們所告訴我的，以及我所推測到的，都來證實并加增我的恐懼。現在

正是法國共產黨應當睜開眼睛的時候了，正是人們應當停止對牠說謊的時候了。不然，勞動者羣衆就要明白他們是受共產黨人欺騙的，正如今日共產黨人是受莫斯科欺騙的。

三年以來，我太沉溺於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以致到了蘇聯反而覺得在異鄉異俗過生活似的。他方面，我也讀了太多旅行記，讚歎的描寫，辯護的文章。我的大錯誤，就是太過於相信誇獎的話。也是因為凡是能夠警告我的話，都是以怨恨的口氣說的。……愛比恨更能得我相信。不錯，我曾有信任心。此外，那邊令我煩惱的，却不在於那些缺點，而在於立刻又遇着我所討厭的那些利益，我所希望取消的那些特權。固然，人們設法來盡可能地款待一位賓客，到處拿最好的事物給他看，——這我覺得也是很自然的。然而使我驚訝的，乃是在這最好的事物和普通的事物中間有如此大差異；在如此平凡或如此惡劣的普通事物旁邊，那特權却顯得如此過分的。

這也許是我的精神及其新教徒教養之一種怪癖罷：我不信任那些有利可圖的觀

念和那些「附和」他人的意見；我的意思是說：傳播那些觀念和意見而希望從中圖利的一些人。

我看見蘇維埃政府拿許多特權給予藝術家和文學家，給予所有那些能夠向牠唱讚美歌的人們；而這不一定是意圖賄賂的。然而我也看見：文學家擁護政府以及那有利於政府的憲法時候，所能得的特權未免太多了些。我立刻就當心注意了。我害怕給人家誘惑去。在那邊，人家獻給我的過分的利益，使我恐懼。我不是爲重見特權而到蘇聯去的。在那邊等待着我的，是確確實實的特權。

爲甚麼我不應當說這話呢？

莫斯科各報告訴我，在幾個月中間，我的書銷行了四十萬本。請你們計算一下，作者應得的版稅有多少。我的論文稿費又付得如此之多的！倘若我寫一本讚美蘇聯和史大林的書，我將獲得多麼巨大的一筆財產！……

這些顧慮并不能阻止我稱讚蘇聯，但也不能阻止我對牠的批評。但我得承認，



凡是能夠執筆的人，祇要他朝好方向寫去，都能獲得這種異常優越地位的（比在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更加優越），而這情形却不少警告我。文學家是最受所有蘇聯工人尊重的。我的兩位旅伴（每人都有一本書譯成俄文，在印刷中），在古董店，在奇貨店，在舊物店，跑來跑去，不知道如何花費那幾千盧布，那是他們剛預支來的版稅，他們知道是不能帶出國外的。至於我，則我僅僅能夠用去一筆大款底零頭數目。因為那邊甚麼東西都是獻給我的。不錯，甚麼東西都是：從旅費起以至於香煙。每逢我拿出錢包來付飯館或旅館底賬時，來開發貨價，購買郵票或報紙時，我們的嚮導底美妙的笑容和威嚴的手勢便阻止我說：「您開玩笑啦！你們是我們的貴賓，您和您的五位旅伴。」

自然，我在蘇聯旅行，自始至終，我個人沒有一點不如意的地方。一切惡意的解釋，造出來減弱我的批評力量的，其中最無理的一個便是企圖將我的批評說做我個人不滿意底表示。我從來未曾在如此奢侈的條件之下旅行過。我們坐的是專車或

最好的汽車，住的總是最好的旅館中最好的房間，最昂貴的，最華麗的，選擇得最精緻的。而且何種的接待！何種的照應！何種的歡迎！到處受人歡呼，恭維，優禮，慶賀。拿來獻給我的，人家是沒有一樣覺得太好，太可惜了的。我若拒絕這類款待，將惹得人家不高興；我做不出來；我由此保持了一種絕妙的紀念，一種熱烈的感激。但這類款待本身令我不斷地想起了特權，想起了差異，而在那裏我想見到平等的。

我勉強擺脫了官方監視，便去同小工往來，他們的工資每天祇有四或五個盧布，而用來款待我，我非到臨不可的那種宴會，——你們要我作何感想呢？差不多每天都有一次宴會，點心小菜之多已夠人吃了三個飽了，而正餐還未開始哩！六大的盛筵，足足有兩個鐘頭長久，使得你不耐其煩。何等的浪費！我從來沒有能看見一張賬單，可以讓我確知一餐底代價。但我的一個旅伴，很熟悉物價的、估量每次宴會，每客須費三百盧布，連酒水在內。我們一共六個人，連我們的嚮導七個

人，時常還有同樣多的主人和陪客，有時還多得多。\*

在整個旅行當中，恰切說，我們並不是國賓，而是有錢的。維埃作家協會邀來的客人。每逢我想起這個團體款待我們的費用時，我不禁懷疑：我的著作權金礦，即使完全送給牠，是否足夠賠償牠的損失。

顯然，他們如此慷慨接待我，是希望收回另一種的利益。我想真理假對我的氣

\*我摘錄我的旅途隨筆一頁如下：

「宴會約定在八點鐘，八點半鐘開始入席，九點一刻鐘尚未端完套前小菜。（我們在文化公園洗過浴，赫巴，達比，柯爾佐夫和我；我們肚子餓得很。）我吞食多量的小點心。療養院有人等待我，九點半鐘，我看見端來湯匙時候，就退席了；一種蔬菜湯，裏面有幾塊雞肉。人們宣告有蝦尾，有香菌，有魚，有各種燒烤及蔬菜。……我離席去收拾行李，以後又寫「幾行」給真理報關於今日典禮的。我回來時還得吞下一大塊凍肉，我不僅害怕而且厭惡這種盛筵（我須得同柯爾佐夫說去）。這種盛筵不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反社會的。」

憤，一部分是由此而來的，卽是：我是不十分『出息』的。

我告訴你們，在我的蘇聯遊歷中有種悲劇的成分。我以一個熱情者，一個虔信人資格，來到蘇聯，爲得欣賞一個新世界，而人們却拿舊世界中我所厭惡的一切特權獻給我，藉以誘惑我。

「你不明白的，」一位優越的馬克思主義者告訴我，「共產主義不過反對人剝削人制度。——這話我應當向你重說幾遍呢？這事辦到了，你便可以同阿列克西·托爾斯泰或大歌舞院底一位歌人同樣富有，祇要你是憑靠個人勞動獲得財產的。你對於金錢，財產之輕視和仇恨，我認爲是你的當初基督教觀念底一種很可惋惜的殘留物。」

「也許是這樣。」

「那麼你應當承認，這類觀念是不合於馬克思主義的。」

「可惜得很！……」

我很知道，而且人們反覆告訴我：某些性格，有時是最可愛的，譬如那種忽然的親密，那種不經思慮的慷慨，立刻獲得我的同情的，以及那些無可遁逃的錯誤，以致敗壞了良好成績的，——這一切應歸咎於俄國人底半東方性的氣質，而不應歸咎於新制度；這一切，優點或缺點，我在俄國帝制時代也可見着的。同樣，我也相信，若期待或希望社會環境不同，便可澈底改變人性，那就是一種錯誤。請大家聽我說：重要的，足夠的，乃在社會環境不同可以容許人性之改變；而這是不起的。但那絕不是唯一的原因。因為這裏沒有機械的東西；而且沒有個人預先改造的話，我們就看見：資產階級社會又形成起來了，「舊人」又出現，而且又揚眉吐氣了。

當某人還在受壓迫時候，當社會不平的束縛使他屈服時候，人們有權利希望他的身上蘊藏着許多力量。猶如人們期望某些神童，但他們以後時常變成了非常平凡的成人。人們時常有這種幻想，以爲某民族包含着比其餘使人失望的人類中更良好的人物。我則簡單相信這民族是較少『腐敗』罷了！但金錢也能使之腐敗，同其他民族一樣的。你看在蘇聯發生的事情：這個正在形成起來的新資產階級，具有——我們的資產階級底一切惡德。牠剛從貧窮地位爬上來，就已經看不起貧窮的人了。牠貪圖那牠好久沒有的一切好處，牠知道應當如何去獲得并如何去保持起來。『這些人果真是實行過革命的人麼？不是的，這些是享用革命利益的人。』——我在我的從蘇聯歸來中寫過這幾句話。他們可以加入共產黨，然而心裏沒有絲毫共產主義者底氣味。

然而這點仍是確實的：俄國民衆表現快樂。這裏我完全同意於維德拉克和約翰·邦士所引證的事例。我每讀他們的旅行記，都要懷戀不已。因為，我也說過了：沒有一個地方能像在蘇聯一樣，人民本身，街上所遇見的人（至少青年人），所參觀工廠底工人，以及擁擠在休息，文化或娛樂場所的那些羣衆，是如此笑容滿面的。這種外表和可怕的貧困，怎樣能夠調和呢？——人們知道大多數人今日是陷於那種貧困之中的。

那些在蘇聯遊歷過很多人，告訴我：維德拉克，邦士和我自己將會懊惱的，倘若我們離開了大中心區和遊客大道以外。他們說起了整個的區域，那裏一眼就看出窮困狀態。此外……

在蘇聯，貧困是不容易看見的。貧困隱藏起來。人們說牠是有罪的。牠不引起憐憫，引起慈悲救濟，反而惹人輕視。出來給人看的，正是那些犧牲此貧困而獲得舒適的人。然而，人們還是看見好多其他的，甚至挨餓的人，他們仍是微笑着，他們的幸福，我說過，乃是由『信任，無知和希望所構成的。』\*

『如果我們在蘇聯所見的一切都是表現快樂的，那也是因為所有不快樂的人都

\*然而還須提到俄羅斯民族一種神奇的生活力。『一隻貓底生命力』，采斯涅也夫斯基談論自己說，當他驚異他經過種種難堪的磨難，雖然痛苦，却仍未受挫折時候。一種對於生命的愛，戰勝了一切，即令是由於冷淡或無情，但寧可說最常見的是由於內心的豐饒，娛樂，抒情，一種未爲人所解釋的，不可解釋的快樂之奔放；無論在甚麼時候，無論以甚麼方式，無論於甚麼地方。……我應當說：一種對於幸福之非常的能力和趨向。不顧一切。正爲這個原故，采斯涅也夫斯基才是如此足爲代表的。也正爲這個原故，他才如此深刻地，如此友愛地感動我，而整個俄羅斯民族經過他，同著他一起，來感動我。無疑，沒有一個其他的民族，能夠如此寬宏地去忍受這樣悲劇式的試驗的。



成了可疑人物，愁苦的人或至少現出愁態的人是極端危險的人物。俄羅斯不是訴苦的地方，要訴苦須到西伯利亞去。

蘇聯生產率是相當高的，多殘殺些人也不容易見得出來。貧乏愈麻木，就愈加悲慘。那些失蹤的人，那些被致使失蹤的人，乃是最有價值的人；在物質的出息上也許不是最有價值的，然而恰是他們能不同流合污，能表現與羣衆有別，而羣衆之統一，其整齊性，是全靠一種庸俗性維持着的，這庸俗性愈變愈下流了。

在蘇聯，所謂「反對派」，其實就是自由批評，就是思想自由。史大林祇能容受頌讚；一切不喝采的人，他都認爲仇敵。時常，他把別人提議的改革，當作自己的東西；但倘若他佔取了那種觀念，那麼爲使之成爲他自有之物的原故，他就先剷除那提出此觀念的人。這便是他的做到時時刻刻都「正確」的手段。如此，不久之後，在他周圍將祇剩下那些不會派他錯誤的人了，因爲他們是沒有任何觀念的。這就是

專制主義之本性：團結在自己周圍的，不是有價值的人，而是那些吮癰舐痔者流。

無論爲了甚麼罪案，送了無論那個勞動者到無論那個法庭去，無論這勞動者如何無辜，倘若上頭要處罰他時候，律師起來替他辯護，這律師就要遭殃了。

還有那些充軍的呢，那些幾千幾萬充軍的呢，他們當初不知道，也不願意，在應當低頭時候低下頭來。

我絕不需要，同某日M那樣思想：「他媽的！終有一日輪到我……」這些被害的人，我見着了，我聽着了，我感覺他們就在我的身邊。這是他們的被堵住嘴巴的叫喊，昨晚喚醒了我；這是他們的緘默使得我今日寫這幾行字。正在想着這些殉道者，我才寫下這惹起你們抗議的幾句話；倘若我的書能到他們手裏，則他們的無言的感激，對於我，是比真理報底恭維或咒詛重要得多的。

沒有人肯出來爲這些被害的人說話。右派報紙至多利用他們來攻擊右派所仇恨

的制度；至於那些衷心藏着正義和自由觀念的人，那些爲援救台爾曼而奮鬥的人，那些巴比塞，那些羅曼羅蘭，則一聲不響；而團結在那些人周圍的，是被人蒙住眼睛的無產階級廣大羣衆。

然而當我氣憤起來時，你們便向我解釋（而且以馬克思之名解釋！）說這惡現象是確實的，是不可否認的（我說的不僅是充軍，而且是工人生活底貧困，工資底不夠或薪水底過分，特權底再得，階級底巧妙恢復，蘇維埃底消失，以及一九一七年所得的東西底逐漸烟消雲散等）；你們很聰明地向我解釋說，這惡現象是必要的；而你們這些有智識的人，這些用慣了辯證法論證（狡辯）的人，容受了這惡現象，認爲是暫時的，是能造成一種更大幸福的。你們有智識的共產黨人，你們同意承認有這惡現象存在了，但你們以爲寧可對那些人隱藏起來才好，他們智識不如你們，也許會氣憤起來的。……

讓人家去利用我的著作罷，我不能阻止，即能亦不願阻止。但對着政黨而寫些東西，讓人家可以利用去，——這我做不到，這是別人底事情。我已經警告過我的共產黨新朋友，自從我們發生關係時候起就警告過：我將不是一個叫大家完全放心的新同志。一個一成不變的新同志。

『智識分子』接受共產主義者，黨應視之爲『動搖分子』，可以利用他，但應當時時刻刻留心他，——我曾在甚麼地方讀過這幾句話。哦，這是何等正確！我曾屢次同瓦勇古久列說這話，但他不肯聽。

沒有一個政黨能夠束縛我，能夠阻止我去愛真理，去愛真理過於愛黨。一到說謊話時候，我就不愜意了；我的責任就在揭穿謊話。我所依附的乃是真理，黨若離開真理，則我立刻離開黨。

我很明白（你們也告訴我很多次了）：『在馬克思主義觀點上』，『真理』是不存在的，至少絕對意義的真理不存在，有的祇是相對的真理；但這裏所關的正是相對真理啊！你們偽造了的，正是相對真理！我相信，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要想欺騙別人時候，已經是在欺騙自己了。因為這裏，你們所欺騙的，恰正是你們自以為爲之服務的：即民衆。一面令民衆盲目，一面就不是好好替民衆服務的。

必須如其實地觀看事物，而不應當以希望其所應成就的的態度來觀看事物。

蘇聯不是我們所希望於牠所應成就的，不是牠允許我們的，不是牠此時還努力裝扮着的；牠已經違背了我們的一切希望了。我們若不容許這一切希望落空的話，則應寄託之於其他地方。

但我們的眼光并不從你轉移開去，光榮的和痛苦的俄羅斯！假如當初你做了我

(72)

們的榜樣，那麼現在——可惜！——你就顯示我們：一種革命能陷落於何種沙地之中。

附

錄





## 旅伴

害怕一個人不夠，我於是邀來五人和我結伴。這也是爲着要讓他們分沾此次旅行底種種非常利便的條件。他們預先就快樂了，簡直是歡喜若狂了；他們同我一樣地熱心，傾心於蘇聯及其所預許的整個未來時代，都是這種政制底熱烈的崇拜者，然而與我又差異很多的；就他們的年齡說（都是比我年輕得多），就他們的氣質，教養和環境說；他們相互間也是有很多差異的；雖然如此，我們互相仍是非常地瞭解。是的，我想，爲看得明白和聽得清楚，六對耳目是不會太多的，而且爲的能夠相互交換各人底一定不會相同的感想。

這幾個旅伴，你們都認識的，就是：耶夫·拉斯特，雪夫靈，歐珍·達比，彼爾·赫巴，路易·季友。

這五位旅伴中，有二個是很老的黨員，很忠實的，很積極的。有二個能說俄國話。此外，耶夫·拉斯特這番是第四次蘇聯旅行。彼爾·赫巴則最近六個月就在莫斯科居住，他在那裏主持一個宣傳雜誌，國際文學，每期用四國文字出版；這就使他很熟悉那些陰謀詭計，很通達內情。此外他又特別地精明。他指教我不少，我的意思是說：他給我解釋了好多事情，沒有他我自己一定不瞭解的。我舉出小小一例如下：

我們到莫斯科第二天（彼爾·赫巴和我是從巴黎坐飛機去的，那時他剛回巴黎來，住了三天；我們比其他幾個旅伴先去，他們坐蘇維埃輪船，十天之後才到列寧格勒），布哈林就來拜訪我。那時布哈林還是很受人尊崇的。最近一次，我不記得那個會議上，他出台時候，羣衆熱烈地向他歡呼。然而已經有某些排斥他的徵兆，

陰險地露出來了。彼爾·赫巴爲要在他主持的雜誌上登載布哈林一篇很可注意的文章，竟遭遇很大的反對。這都是值得知道的，但我後來才曉得。布哈林是一個人來的。但他剛踏進首都旅館人家給我居住的華麗房間底小客廳內，就有一個自稱爲新聞記者的混進來，參加我們的談話，弄得談不成功。布哈林差不多是立刻就起身走；當我送他到候見室時，他告訴我：希望再同我見面。

三天之後，我又看見他，在送高爾基下葬時候，恰切點說，在下葬前一天，那時民衆得到允許，好幾個鐘頭列隊在大停床前經過，停床鋪着花，高爾基屍體尙未燒化，就停在那上面。在一個小得多的鄰近廳堂內聚集着那些「負責人」，狄彌特洛夫也在其內，我尙不認識他，現在我向他行禮。布哈林就在他近旁。我離開狄彌特洛夫以後，布哈林就拉着我的臂膀，靠近我身邊說：

「一個鐘頭之後我可以去訪你麼，在首都旅館？我有話同你說。」

彼爾·赫巴陪伴着我，他聽到了這幾句話，於是低聲對我說：

「我敢打賭，他一定做不到這個事情。」

果然，柯爾佐夫看見布哈林會靠近我身邊，就立刻把他拉到旁邊去。我不知道他能對布哈林說甚麼話，但在我居留莫斯科的時期中，我就未曾再見布哈林一面。

沒有這個小小的指教，我就不明白的。那時我一定以為是冷淡，是疏忽；總之我將以為布哈林并不重視再同我見面的，但我永遠想不到他是不能再見我的面。

彼爾·赫巴和我到列寧格拉碼頭上迎接了季友，雪夫靈，拉斯特和達比，然後我們坐了專用車廂回莫斯科來。幾天之後，同一個車廂把我們拉到鄂終涅啓宰地方去，以後三個很舒適的汽車載我們穿過高加索，第三天到了底弗里斯。我們到這喬其亞首都，照預定的行程遲了一天，以致很客氣地到山中他們的國土邊界汽車站上來歡迎我們的那些喬其亞詩人等候了我們二十四個鐘頭。我趁此機會，在這裏說：我何等感受他們接待的好意，他們的懇摯，以及他們的禮意底自始至終的懇

慙。倘若由於甚麼奇蹟，這本書能到他們手裏的話，那就願他們知道，不管別人能對他們說甚麼話，我仍舊是深深感激他們的。

二

底弗里斯這地方，起初使我們大大失望，但以後一天比一天更迷誘我們了。我們在那裏停留了兩個星期。我們就是從那裏出發到卡黑底做了四天旅行，很好；而且各方面都是最有趣味的；但很辛苦，以致不大習慣於旅行疲勞的雪夫靈和季友兩人回來後，宣布說：他們看夠了，種種情緒也感受過了，他們渴想回法蘭西去。

我們離開了他們兩位，很覺惋惜，因為有他們作伴是很有趣味的。但以後我們也慶賀他們兩人幸而未曾經受因漸漸炎熱而增加的疲勞。

然而我們旅行這第二部分是富於教訓的。沒有以前那樣死板，那樣受束縛，我們還得更直接同民衆接觸；僅僅是從底弗里斯開始，我們的眼睛才真正睜開的。

自從二十年來——有些人說，但其他的人則說：自從十五年來——此地沒有今年這樣熱了。但我們未曾因熱而衰疲，而且沒有一點徵兆能使我們預見三星期後使達比喪命的那個病症。我要抗議而且要氣憤地抗議某些關於達比病症的惡意的暗示。診斷錯誤，——那些最少惡意的人說。在蘇聯，人們將好多因各種成串的球形菌致成的類似的傳染病，都稱之爲「猩紅熱」，——這本是可能的。我以爲真正猩紅熱一開始要嘔吐的，達比並沒有這個特徵。我回巴黎以後一個時候，偶在一本醫學雜誌上看見一張病症統計表，我很驚訝：在蘇聯，「猩紅熱」佔的比例數如此之大，無論同其他國家比較，或同蘇聯其他病症比較；也是由於這個原因，使我猜想：這個病名，在蘇聯比在我們國內，更富於彈性和更常使用的。但這點說過以後（這裏說不上診斷錯誤，——這種事情也可以在巴黎發生的，我有兩個可痛惜的例證：查理·路易·菲力和傑克·里維葉兩人，病初起時都被當作一種簡單的流行性感冒來醫治，到了認出是傷寒症時已經太遲了），我就堅決說：達比是受了最細心

的最周到的醫治的，由於塞巴斯托普地方三個最好的醫生，而且由於女同志波拉，——她在這裏還是表現十全的惡擊。

同樣，我也必須抗議另一種惡意的暗示，關於達比底筆記的。這些筆記以及其他屬於他的一切稿件，都由我經手送給他的家庭了；不錯，被扣留了一個時候以後才送去的。其實裏面絕對沒有使檢查官爲難的地方。達比是非常謹慎的。他不止一次告訴過我：他要把說話之責託付給我。\*他很擔心，不願加入那足以擾亂他的安寧和工作的辯論。在最後幾天，他差不多是唯一地顧念着這個工作，即他同我說了好多的那部小說，他計劃再寫，完全改寫，現在他更看清楚了他要寫的是甚麼；我想，他出發旅行前所寫的一百頁左右稿子，將差不多完全拋棄的。

\*最後幾時，耶夫·拉斯特和彼爾·赫巴兩人輪流地和他同房間，他有機會同他們談話，比同我更多而且更親切地。他們兩人知道這個。爲此原故，他們出來抗議彼爾·西采先生對於我的這個攻擊（這個攻擊，後來弗里曼也拿來了，雖然是以一種很有禮貌的聲口說出來的），即說我濫用了達比之名，獻

我的書給他，寫道：「我在他旁邊，跟着他，所見聞的，所思想的之反映。」

猶絲彼爾·赫巴一篇論文

「我要告訴弗里曼——回答他關於從蘇聯歸來上給達比的獻辭的話——以我同達比在塞巴斯托普一  
次談話，在他死前不久。

他表示非常就心紀德回法國後要公開發表與他在旅行中時常有同感的那些恐懼。「他將會說得好  
的，」他說，「人們將明白他是以友人資格說話的。」

無論人們對這種獻辭的感想如何，但我認為絕不能反駁紀德將我們的朋友底名字連結於他對蘇聯的  
感想的那種權利以至於義務。」

(星期五，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還有耶夫·拉斯特這封信

我的親愛的弗里曼：

我十分驚訝讀到你的論文中如下一條小註：

「但達比不會比紀德更進一層，批評，完成，這些印索麼（他打算延長在蘇聯居留期間，說起還要



再來的話)？他不會更勝於紀德認識了心理學價值以外發生的事情麼？他曾允許給予這些印象(當我們在黑澤相遇時候，他自己曾對我說這些印象是不充分的)以這樣大的政治意義麼，而且在這樣一個時候？

這些問題是可以提出來的，祇要是可以提出來，我就沒有權利默而不言。

這話，我認為不很恰切。

在底弗里斯，達比就已開始感覺旅行無味了，一種令人為難的態度。我同他有好多次的談話，但他從來未曾表示要更長久留在蘇聯，或再來一次。恰好相反，他固執地反對延長旅行計劃去遊基輔。他要立刻回莫斯科去，由那裏坐飛機回巴黎。達比屢次表示願在西班牙一個小鄉村中安靜地工作，完成他的關於希臘人的著作。蘇聯有好多事情使他不喜歡，但我們對這些事情的感想，始終是很差異的。達比時常同紀德談論這些事情，他自己既然不是一個有戰鬥精神的人，他便將說話之責付託給紀德。我敢說，紀德寫的那本書，正是達比所期待並要求於他的。

耶夫·拉斯特

「回國後，我即將從頭寫起，」他屢次對我們說。而這個內心要求如此逼迫他，以致他說：他要單獨回去的，倘若我們在歸途中還要耽擱的話。那時正有人提議到奧德撒及基輔去的。

達比同我一樣，同我們所有的人一樣，也表示很痛心於好多事情，雖然看到那些能使人欣喜的東西，因為他同我們一樣希望在蘇聯祇見着這些使人欣喜的東西。達比是從下層民衆出身的，他的心和精神都深深關切於無產階級利益；他方面，他的氣質是很少戰鬥性的，與其說他接近於吉訶德先生，毋寧說他接近於桑科·那黎；他自立一條蒙田式的箴言，認為生命是比任何理想更可寶貴的，人們不值得為任何理想犧牲自己的生命。他表示很耽心西班牙事變，他的憂慮也可以從這裏看出來，即人們若有個時候懷疑政府軍之勝利，他也是受不住的。這個勝利，他不予支持之或相信之為滿足：他不斷地需要將這勝利看做是有保證的。但他激烈反對

耶夫·拉斯特，當拉斯特說起要到西班牙去，加入民軍作戰（他以後不久果真這樣做了）時候。某天晚上，在塞巴斯托普，即我們在一起過的最後一日之前夜，我看見達比真正發氣起來了，他平時是如此恬靜的。耶夫·拉斯特剛宣布說：他寧可看見他的兒女死，不願看見他們受法西斯統治。

「你這話說得豈有此理，」達比於是叫喊說（這是第一次，我聽他用如此聲調說話），一面用拳頭搥槓子，我們剛在這槓上用完了晚飯。「豈有此理！你沒有權利爲一種觀念犧牲了別人底生命，也沒有權利犧牲你自己的生命。生命是比一切都更寶貴的。」

他還說了好多，忽然有了一種非凡的口才。耶夫也是雄辯滔滔的。我祇限於聽他們說話，有時贊成這個，有時贊成那個，隨着那一個人在說話；或寧可說：倘若我比較地欽佩耶夫和那鼓動他的熱情，那麼我是特別贊成達比以及他的反抗起來的良知的。尤其我想：人類中有這個人和那個人是很好的，好在這個可以調劑那個。

但忽然我來干涉了，當耶夫回答達比談起了「怯懦」時候。我抗議說，「怯懦」這個字眼在我們中間是不能行用的，倘若時常需要一種大勇去戰鬥的話，那麼有時也需要同樣的大勇來宣告說：不戰鬥。

在寫這幾行字時候，我忽然想起了卓諾和他的拒絕服從。達比很喜歡卓諾，而且在某幾方面很像卓諾。這兩個人是很有興味和「菜湯感覺」的（同有此感覺的人才能懂得這話底含義）。\*我們在喬其亞時常說起卓諾，我們以為這個洪荒的和饒沃的國土是非常能使他喜歡的，我們又以為他將感受很多痛苦，在凡失却了「菜湯感覺」的地方。

\*「他們撒謊。他們都撒謊，」又告訴我們，在底弗里斯，談起了蘇聯當權者時候。那時祇有赫巴和我聽他說話。「他們完全失却了和真正現實的聯繫。這些都是理論家，都迷失在抽象觀念裏面。」他的聲音因興奮而顫抖了。最後就說了這句話，起初我沒有大注意，以後赫巴時常向我提起，因為他認為這話妙得很（本來是妙得很），時常徵引來說：「他們都失却菜湯感覺。」

并非達比完全感覺旅行無味，而是他終於比我們較少興趣去注意旅行；他漸漸地好獨處了，專心於讀書或寫字。<sup>\*</sup>那時他讀孟果譯的死魂靈，這書是我帶來的；他時常讀一段給我欣賞。尤其戈果爾詩集第二卷頭上附的四封信中幾行字，即我在我的從蘇聯歸來書中所徵引的。還有這幾行呢，這就使得我們懷疑：是否真如人們所常說的，俄國帝制時候沒有或差不多沒有給民衆做一點東西；至少沒有可供人們誇耀的東西？

「差不多一百五十年過去了，自從彼得大帝開了我們的眼睛，叫我們學習歐洲文化，並將一切實行手段交付於我們之手。……」

自從那時以後，「政府不斷地活動，由這些可以證明，即是：幾大本章程，法律和命令，好多新建的房舍，出版的書籍，設立的各種教育，慈善，賑濟等基金，

<sup>\*</sup>「我是何等願望寂寞和安靜！」死前不久幾天，他在他的秘密筆記中寫過這句話。

至於那些外國政府設施中找不到的東西還不算在內哩。」

不管蘇聯如何鋪張，我們由此可以知道，這手段不是今日發明的。

## 旅途隨筆摘錄

那個永遠慫恿的柯爾佐夫表示要同我說機密語的樣子。我明白他祇能告訴我，他認為告訴我不礙事的事情，但他裝做這個樣子，使得他的信任能獲取我的歡心。以：對於你，我是沒有甚麼隱藏的那種態度，他開始說：

「你想像不到我們每一步遇到的那些希奇古怪的問題；我們必須發明一些新辦法來解決那些問題。你試想想，那些最優秀的工人，那些斯塔漢諾夫運動者，一大批一大批地逃開工廠……」

「你們怎麼解釋這個呢？」

「哦！這是很簡單的。他們得到很大的工錢，即使他們要也是沒有辦法花費掉；因為市場上還祇有很少的東西買得到。這個正是我們最關心的事情。於是他們

積蓄起來，到了有幾千個盧布時候，他們就結伴到我們的里維拉過快活的闊綽的生活去了。我們挽留不住。既然是優秀工人，他們知道人家一定要再用他們的。他們回來了，過了一個月，兩個月之後，……總之到了他們囊空時候。人家非再安插他們不可，因為離不了他們。」

「如此，你們就難於處置了。他們人數很多麼？」

「幾千幾萬的。你知道，每個工人有權利休假，假期費用由公家支付的。這種休假，人家於適當時期容許他們，而且不是做一次容許他們，因為不用說，怕妨害工廠工作。但這裏就完全不同了。這裏，付錢的是他們，如此得到的假期，可以隨他們的便，愛甚麼時候去就甚麼時候去，而且大家一齊去。」

他溫和地笑着。我不說出來，但心裏仍在想：倘若這惡現象是嚴重的，他說時一定不是這個態度。但這是爲的接着恭維史大林底一種巧妙的新發明的。他不是想  
出提倡婦女豔妝，脂粉和首飾麼？\*



「去罷，同志們，去照顧你們的太太罷！把她們裝扮起來罷！爲她們耗費你們的錢罷！」

近來開了好多新商店；而這也使我驚異不小，即是開了好多修指甲店，而且各方面（不用說，主要的是在得意的一方面）遇到了染紅指甲的女人。

「你每月薪水多少？」女同志且問一個主管X旅館「美容所」的女人。

「一百五十盧布。」

「供宿的麼？」

\*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漢理羅表發集體農場分子底信，關於服裝問題的。信內說：

「我們也能夠穿得漂亮些，因爲我們有愛美觀念，我們要學時髦。

至於我，那我不喜歡鐘錶袖和飛機式的短衣。但因沒有新的樣式，我們祇好着這類衣服。我們是有錢的。」

「不；也不供儲。至少要付二十盧布房租。」

「那麼你祇剩一百三十盧布了。伙食呢？」

「哦！我非兩百盧布不夠吃飯的。」

「可是那麼你怎麼辦呢？」

愁慘地微笑着：

「太太！……總有辦法啊。」

耶夫，在塞巴斯托普，同一個大學生結交了友誼，這大學生並沒有甚麼很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最使耶夫感興趣的，恰正是因為他極像多數其他的學生。耶夫可以經過他知道一些事情，然後轉過來告訴我們。

X是現行制度之熱烈的崇拜者。他滿含信任和希望。他是大學第一年級生，每月支領六十盧布。他很歡喜想到明年可以支領七十盧布，後年可以支領八十盧布。

他本可以住在學生寄宿舍裏，那裏每餐飯買一個盧布或二個盧布；但他不願離開他的老母親，一個無技藝的廚娘，每月賺九十盧布。母子兩人住在同一個房間內，每月共付十盧布房錢，他們差不多是祇能買黑麵包來吃的，而且不能吃飽（一天四百格蘭姆）。但這是一種「完全的食物」啊，他說；而他不發一個怨聲。他深願邀了一個女伴到這已經住兩個人的房間裏住。他的母親要他邀來，要他結婚。然而取締墮胎的新法律使他恐怖。

「你試想想，我們已經很難得生活了。要養一個孩子，那就更加……哦！我知道你要告訴我甚麼話。但那些避孕的東西是找不到的，即有，質料也很壞，不能信賴。至於防備受孕方法，則在我們所居住的環境之內是不容易做到的。」

以後他的樂觀又佔據上風了，他快快活活做結論說：他如此吃得壞，寧可節慾好些。

倘若那邊某醫生底話是可信的，那麼蘇聯是手淫最普遍流行的國家。

新建築計劃在研究之中。建築師N提出一些房屋圖案。

「這個地方做甚麼用場？」

「給娘娘住的房間。」

「娘娘？……可是你知道，我們已經沒有娘娘了。」

既然理論上已經沒有了娘娘，那就是一個很好的理由，叫娘娘住在走廊裏或廚房裏或無論甚麼地方。

預見一個給娘娘睡的房間，這是何等老實的供認！在蘇聯，倘若仍有婢僕存在的話，則做婢僕的人更該倒臺的。

在莫斯科，爲得每月五十盧布工錢找娘娘做的，差不多都是窮苦姑娘，從她們

的鄉村跑來，希望在城裏，工廠或其他地方找到工作的。她們暫時做娘姨以等待工作；這是候工的一種辦法。我的朋友且底同樓鄰居雇的娘姨是個孕婦，那鄰居是大發慈悲才雇用她的。她睡在一間小房裏，沒有位置給她伸直睡。至於飲食……

她時常來請求我的朋友：

「請太太莫把麵包屑丟掉。」

她就在垃圾桶內檢麵包屑吃。

說實在話，我絕不認爲這些官方的判斷，這種意見底製造，能得每個人誠心同意的。有些名字，尤其葉先寧之名，祇能低聲說出來，然而還是說出來的。我應當說：還是有人稱道的，然而低聲稱道。我很少知道葉先寧底詩；但我就要敘述的那個小故事，使得我渴想去讀牠。葉先寧自殺了，同馬耶可夫斯基一個樣。爲了戀愛，——人們說。也許。隨我們的意去想像更深刻的自殺原因罷。

某天晚上，在索起，一頓很好的晚餐之後，我們都傾心相向。葡萄酒和燒酒亦有相當助力。X喝得尤其多，他動了詩興。我們的嚮導表示有點不放心。X要饒舌了。……他竟至於宣布要誦葉先寧底詩給我們聽！嚮導立刻干涉他：

「你醉得糊塗了。你不曉得說的甚麼話。莫作聲罷。……」

於是X，很自覺地，雖然醉仍能自持，便暫時不作聲了；然後利用這醉態，請那位嚮導出去替他弄一包香烟。嚮導一走之後，X便開始誦一篇非凡的詩，這詩自從被禁止印刷以後，便由人們口頭傳誦起來。葉先寧寫這篇詩，是爲回答一篇謾罵宗教的論文而發的。

葉先寧在這詩中大意是對這論文底著者說：你若反對教皇，我們一定贊成你；我們同你在一起，當你嘲笑天堂和地獄，聖童貞和好上帝；可是你若說起耶穌，那就應該當心，你不應當忘記：這爲人類而犧牲者并非結合塵世間的大人，而是與那些貧窮的和卑賤的同盟，他認爲人家稱他神子，不如稱他做「人子」那般光榮。\*

X聲音顫抖了，當他朗誦這詩篇時候，以後他的面孔流滿了眼淚，——這不僅由於酒醉之故。這晚上我們本祇說些不相干的話。然而不然；寫這句話時，我覺得對不起X，也對不起我們自己。X漸漸地使我們興奮起來，我們聽他敘述他在中國奇異的冒險，他的屢次被捕以及他的逃脫等，不覺神往。不能說他是美麗的，但有一種狂野的精神使他勃勃有生氣；他的聲音本是既嘶啞而又熱烈的，可是當他給我們誦詩時候，忽然異常溫和起來，同剛才說話時那種犬儒主義和粗暴，成個最奇特的對照。好像他要人家發現他身上有祕密的溫柔區域，一種未為人知的區域；忽然我覺得：那是最真實的，而其餘一切，犬儒主義和粗暴，在我眼中不過是一種假皮，來保護着他身中最好的事物罷了。這個景象不過露了一瞬間。嚮導回到我們

\*我曾請求幾位能讀俄文的朋友替我找葉先寧這篇詩，無疑我上面所錄的是很不完全的。他們尋找不到；於是我懷疑，最近幾版官印的著作中，人家也許沒有把他刪去。這是可以考查出來的。此外，有人告訴我：流行了好多詩篇，假冒是葉先寧所做的。

身邊來了，談話又恢復了原來狀態，喧鬧的，而又空洞的。

面對面在一個堅硬的車廂內坐了七個鐘頭長久，那位俄國青年才肯同我的女友H同志說話；H告訴我，這青年從旅行開始就引起她的注意和同情了。

「他年紀不能過三十歲，但看來已經爲生活磨折得很衰老了。我用了何種力量才能使他不致敷衍回答我的問話，是可想而知的！特別是我留心告訴他，我不過是一個外國女人，他絲毫不用怕我，無論他說甚麼話我不會去報告的。……他的妻同他在一起，他們還帶了一個三歲的兒子。我聽到他還丟了兩個小孩在X地方，爲的節省開銷并恐怕在莫斯科不一定能找到事情做。」

他的妻以前一定是好看的，此時好像大病後痊愈的一樣。使我大驚訝的，即是看她幾次餵小孩子奶，這小孩早就應當斷奶了。那奶懸垂着，像空心的皮袋，我不知道小孩子能夠吮出甚麼東西來，但在整個行程中小孩子並沒有得到其他的食物。



他的父母似乎比他更加饑餓。當男人終於開始說話時候，那個年青女人就流露一種說不出的憂慮。她東張西望，看鄰近旅客能否偷聽去。但我們的房間內祇有一個在睡覺的老醉鬼和一個蠢笨的鄉下女人。好像道歉一樣：

「他總是愛饒舌的，」她對我說，「總是因此害了我們。」

於是男人告訴我他們的生活：基洛夫暗殺案發生以前一切都是很好的。以後，他不知道，甚麼人告他，使他蒙了嫌疑。他既然是個優秀工人，而又無疵可指的，人家沒有立刻將他辭退他所做工的工廠。但他看見，他的夥伴們，他的朋友們，漸漸疏遠他了。每個人同他說話時候都害怕受他連累。最後工廠經理叫他去，并非辭退他，因為沒有理由，而是「勸告」他到別地方找工作去。從這天起，他就流浪了，從這工廠到那工廠，從這城市到那城市，漸漸地更被猜忌，更受驅逐，到處都被入懷疑，拒絕，排斥，不得任何扶助，任何救濟，更加得不到甚麼東西給他的孩子們，而陷於極端貧困之中。

「你看，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年多了，」女人說，「我們再支持不下去了。自從一年多以來，無論到甚麼地方，人家從未會容留我們到十五天以上的。」

「即使，」男人再說，「我能知道人家控告我的罪名也好。一定有人說了反對我的話。我不知道是誰。我不知道他能說甚麼話。我祇曉得一件事情，就是：人們找不到我的錯處的。」

於是他向我解釋他到莫斯科的用意：爲的請求調查，洗刷嫌疑，倘若可能時候，否則在抗議這無理由的猜疑之中索興完全斷送自己的命運。」

有種香烟每包賣八十哥比，甚至六十哥比；這就是所謂「無產階級烟」，不堪入口的。我們抽的香烟，——外國人祇知道有這一類，其中有幾種被稱爲「旅客烟」——則每盒二十枝值五或六個盧布。還有更貴的哩。

不知道賣烟商人在那裏（在戈里地方，我們在那裏停了幾個鐘頭），彼爾·赫

他便請求那與他在河邊談話的工人替他去買一盒這類香烟。

「多少錢的？」

「五個盧布的。」

那工人非常幽默地笑起來，說道：

「一天的工資啊。」

X太太在莫斯科郊外遊玩，一位「負責人」（那邊對當權者的稱呼）和她作伴。這「負責人」遇着所有的工人總是表示非常親切：「我喜歡他們能感覺是與我不平等的。我同他們談話，好像對朋友，對兄弟一個樣；而他們從來不害怕同我說話的。」

路上遇着一個填土工人，爲證明剛才說的話起見，這「負責人」便說：

「好麼，我的朋友？你好麼？你快活麼？」

於是工人說：

「同志，你容許我問你一個問題麼？」

「問罷，我的朋友。我很情願回答你的。」

「你是知道很多事情的，你一定能夠指教我。我們何時才能按照我們的力量做工，盡着我們的肚皮吃飯呢？」

「這「負責人」怎麼回答呢？」我問又太太。

「他給工人做了一次理論講演。」

坐汽車到巴頓去的路上。我的旅伴們讚美公路兩旁新植的樹，這些樹幾年之後將能遮蔭路面。我爲甚麼要提醒他們，所有這些樹當中沒有一株不是死的呢？無疑是在不合適的時期植下的；我的意思是說：在一個不利於樹底生長的季節；我猜想是爲着服從上頭下來的一個命令，必須遵照實行而不許批評。這是要自然界來屈服

的，不管是樹，是人。

這裏（在蘇虎姆），人們養了好多猴子，爲各種試驗之用的。我要知道這些動物底來源。但這裏同在殖民地一樣，關於一事的說法有種種不同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大多數人精神以籠統浮泛爲滿足，尤其是那位替我們當翻譯和嚮導的可愛的女同志。總之沒有甚麼事情能爲難她的，她回答一切的問題；她愈加無知，回答的口氣愈加堅決。但她不知道自己無知，她使得我明白這點，即：不自知的無知造成了確定的表示。這類人底精神裝滿了『差不多』，『類似』以及錯誤的智識。……

『可以知道這裏養的那些猴子是從甚麼地方來的麼？』

『自然。那是最容易的事情。』

（她於是轉問那陪伴我們的人）

『這些猴子大部分是生在這裏的。不錯，差不多都是生在這裏的。』

「但據人家告訴我們的話，這地方并不出產猴子。一定是先從別處弄來的。」

「自然。」

「那麼究竟從甚麼地方弄來的呢？」

沒有轉問別人，她就迅速而果決回答道：

「差不多是從各地方弄來的。」

我們這位女嚮導是可愛而又十分盡職的。但這個有點令人討厭，即她指教我們的話，除了都是錯誤以外，沒有一件說出所以然的。

——回歸巴黎——

「他媽的，你從何處見出這些當權大人物享有特權？」那位C對我說，他從那邊回來，完全被迷惑了。「我同K往來很密切，他是如此可愛又如此樸實的；他叫

我去訪他的住宅，裏面我沒有見到甚麼奢侈闊綽的東西。他的妻，他給我介紹了，也是可愛而樸質同他一樣……」

「那一個妻？」

「甚麼？那一個妻？他的妻，總之……」

「哦，不錯，他的正妻。……你不知道他有三個老婆。還有兩個別的住宅，至於鄉居休養之便利還不算在內。他有三輛汽車，你所見的是最樸質的一輛，爲平常家務用的。……」

「這是可能的麼？」

「不僅是可能的，這是事實。」

「可是，黨怎麼能容許呢？史大林怎麼……」

「你不要如此天真。史大林所害怕的，乃是那些純潔的人，那些瘦子。」





## 書信與憑證

給 A. G. 尼斯「蘇聯友人會」副書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先生，親愛的同志：

我很感謝你寄給我的東西。人家的確通知過我，而且允許給我彼爾·亞歷山德里在尼斯的講演稿；但直至如今，我甚麼都未曾收到。現在我讀這講演稿帶着很濃厚的興味，雖然其中沒有一點出我意外的。所用的論據，所引的數字，沒有一件是我所不知道的。這些數字，我固然難於辯駁，正如我難於毫無不信任心而接受之一樣。我希望這些數字是始終正確的，我也全心禱祝彼爾·亞歷山德里底話有道理。這就使得我陷於不愉快的地位來同他辯論。我感謝他能明白：我無論如何終是蘇聯友人，而我的憂憤是很難受的。不錯，我願意我是誤會了，在這我不得不做的難堪

的反證裏頭，這種反證恰同瓦爾脫·西特令爵士，工黨大領袖，所做的一個樣。

我認爲他有資格來審查彼爾·亞歷山德里不加考慮接受來的那些統計數字是否正確。西特令也是欽佩那邊人們的努力和大量成績的；他也認爲由於內外環境關係蘇聯也許不能夠獲得更好的成績；但他所氣憤的乃是人們距離成功還遠得很，——他咒詛一種誇張和虛誑的宣傳。「那些不利於你們的統計，你們就刪除了，」他對他的嚮導說，「那些不足以證明你們的人民生活比其他一切國家都更幸福的統計，也是如此。蘇聯人民底生活狀況究竟是怎樣呢？若非親身去非常細心地調查一下，就沒有可能知道的……」

彼爾·亞歷山德里底批評是最客氣的，他的顯然的誠意使得我告訴他：「我也許是比我的書中敢於發表的知道得更多些，更正確些（由於切實的原因不能發表的）。首先，我不是一個人旅行的；五個旅伴之中祇有兩個人於第一個月旅行之後

\*見他的我在蘇聯探求真理。

離開了我——大家出發時都是同我一般熱烈的——；有二個俄國話說得很好，第三個則剛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過六個月，在這期間他能夠看見并瞭解好多事情的。這幾位旅伴個人的見聞，不斷地與我自己親歷的相符合；若是沒有他們，尤其沒有那位在莫斯科生活過六個月的人底精明，則我無疑差不多不知道一點那隱藏在迷人外表下的東西，而我從蘇聯歸來也一定要同着亞歷山德里合唱讚美歌了。反之，我也不能相信，倘若亞歷山德里，以他所透露的完全的誠意，見過，聽過和驚訝過我能見，所能瞭解的一切事情，而不會變成同我現在一樣。我所能徵引來作證的那幾件事實，絕不是甚麼孤獨的，特殊的，例外的，如亞歷山德里所說；我徵引這些事實，祇因為那是可為典型的，可為代表的。我還可以舉出好多其他的事實。祇因恐怕連累了那些告知我的人，我才不請他們出來作證。

蘇聯狀況無論如何不如人意，如何糟糕，我一定會默而不言的，祇須我至少能確信那邊是向着更好的情況走去。正因為我不幸深信蘇聯是在梯子上上一級一級下來

而非如我們所期望的一級一級上去，牠一個個拋棄了大革命辛辛苦苦得來的利益（我承認總是有很好的理由，或至少有似是而非的理由拋棄這些的），正因為我害怕看見牠拖帶法國共產黨走向那不可挽救的錯誤去，——所以我才認為我有不得不言之責任。

你若認識彼爾·亞歷山德里，就請告訴他，我如何感謝他的批評底完全客氣的態度。再說一遍：我禱祝他的話是有道理的。

在顧維位爾，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

我的親愛的X：

去年我曾在波林那奇住過十天，下過礦，混在工人尤其失業者羣中。里爾地方，你的夥伴們底困苦是不會更甚於他們的。相信蘇聯，這并不能使這種困苦減輕難忍的程度。你將說：這至少給他們一點希望。那麼天堂生活以及來世報償底希望

還好些哩。

在我的書中，我太重於『文化價值』之損失了。一個民族正在挨餓受凍時候，人們首先設法要保存的就不是『文化價值』了。我也同意，在一段長期間內，若是民衆底物質狀況能有更好保障時候，『文化價值』也不妨損失下去。可是，在蘇聯，這兩方面都要損失的，而這是可怕的。

這是可怕的，看見革命千辛萬苦得來的利益，一個個被拋棄了。此時正是應當睜開眼睛的時候了，來看這悲慘的破產，我們的希望有在其中熄滅的危險。此時重要的不是叫我們被拖帶進去。照蘇聯現在這樣進行下去，則資本主義制度下最受我們指責的東西，不久就要恢復起來了。工資差異愈變愈大，社會階級重新形成，官僚分子得到勝利。再說一遍：我同意那邊的精神不妨同在德國和意大利那般不自由，祇要至少羣衆底生活舒適是有保證的；然而我們離此還遠得很哩。人們對我說：容忍現時狀況罷；惡現象是暫時的；這是扶梯起頭，是扶梯上的一級。然而這

個扶梯，蘇聯并不是爬上去，而是走下來；不久，十月革命就要從頭做起了。現在正是呼喊：『停住！』的時候了，正是警告的時候了。

在巴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

先生們：

你們寄給我的集體書信，\* 可惜沒有一點出我意料之外。但其中含有一種重大的侮辱，是我不能放過的。

爲甚麼你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想到拿你們所說的甚麼『好買賣』去同蘇聯獻給我的；罕有的利益，豐富的金錢以及所有一切榮譽的事情，相較比一下呢？

爲甚麼你們獻給我你們的團體底主席位置時候，是如此不認識我，以至於不知道這類顧慮是不能打動我？

倘若我同意跟別人一起說謊語，那時你們就真有權利說起一件『好買賣』了！

在巴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七區共產主義青年團青年俱樂部用箋

致安德烈·紀德先生

先生：

細心讀了你的新著從蘇聯歸來之後，考慮過其中各種論據以及所謂遷徙之後，我們現在向你表示我們的氣憤和深刻的厭惡對於那種對蘇聯的陰險的攻擊。

在這樣一個愈加需要我們保衛蘇聯的時代，我們看見你的轉向以及法西斯報紙上褒獎你的話，是十分噁心的。

我們有個時候希望你會出來否認黎巴同志十一月十八日在幻城戲院青年大會上所宣布的話；不幸你未曾出來否認，於是我們可以做個結論說：你的書不過是一件好買賣罷了。

現在我們認為你不配做我們的名譽主席了。

我們感謝你於八個月之中給予過我們的援助；現在，先生，我們請你接受我們的敬禮！

然而那時你們甚至沒有想到來審查我是否誠實的。當我看見你們如此輕易地提出如此荒謬的控告時候，你們其他地方之見笑於人就不怎樣使我驚異了。

你們的信是手寫的，也許未曾留下底稿，現在我用打字機打了一份給你們，憑着你們的光明態度，讀你們將這原信向你們那些尚未知道此信內容的同志，公開宣讀；我這封回信也請你們宣讀。我不能相信你們當中沒有幾位同志肯看清楚這件事情，肯明白事物之真相。我不懷疑你們將有一天仍舊要信任我，而且更加尊敬我；現在同以前一樣，我仍是你們的忠誠的朋友。

A. G.

彼爾·西志先生在一篇論文中猛烈攻擊我，這論文很可以拿來同不久之前利·伯洛攻擊我的那些文章相比。

我并不重視這類攻擊，此次攻擊，倘若不含有那我認為必須指出的事實錯誤之



處，我也是要放過的。

西志先生在他的文章開頭上敘述兩件小故事，兩件「實事之實事」，他說，足以顯示其人品性的。底下是第一件：

彼爾·路意士，我初從事文學時時常往來的友伴，約我在聖蘇比士廣場相會。那時是冬天。冷得很怕人。在半點多鐘內，我冒着雨，在泉水旁邊呆等着，路意士則舒舒服服躲在一家店舖玻璃窗後看我捱冷以取樂。

西志先生敘述的故事本身是正確的，而且與我敘述的相符（見我的倘若一粒麥子不死時，第十章）。不過他，乾脆地，毫不顧忌地，掉換了人名：旁觀的是我，捱冷的却是路意士，——不管情理如何不符，不管心理如何不合。但我不肯同西志先生一樣，將這事情看作一種無聊行爲。在我眼中看來，這祇是而且祇能是這無數的惡作劇中之一件，彼爾·路意士那時最會玩的，爲的看看他能作弄我到甚麼程度。不是，西志先生，你信我的話：彼爾·路意士不是一個無聊的人。

底下是第二件「實事之實事」：

愛彌兒·魏發命和他的朋友，威利·史洛巴赫，比利時畫家，動身到布魯塞律郊外建築師奧克塔夫·凡·黎塞伯格——畫家底兄弟——家裏吃飯去。魏發命負責去購買車票，回來遇到查票時，他尋來尋去祇尋到一張，他喊道：

「上帝在上，威利，我失掉你的車票了！」

這話，西志先生派做是我說的，他認為這是卑鄙的自私自利之表示，而其實當時是喧傳人口的，而且成爲魏發命諸友說笑的資料。魏發命是第一個笑這話，而且很高興常常提起來說。但凡認識魏發命的人，都明白他的慷慨是如何超出他的自利之上。不是，西志先生，你信我的話：魏發命毫沒有一點小家子氣。

靠着這種張冠李戴手段，西志先生替我畫了一幅肖像，我自然要認爲與我不相像的。他的論文其餘部分也是一樣的無恥，這更加顯得他的激昂了。他提起了一風

化」問題。當我從剛果回來時，波拿狄爲破壞我的作證底信用，也是使用這個手段。但這裏，我祇能歸咎我自己：我供給敵人以武器。倘若我悲歎一件事物，那就是：這類攻擊之卑鄙，在文藝界中，將有使人不敢坦白說話之危險。西志先生用的是史大林底方法：威嚇真理。然而請他允許我告訴他一句話：這裏，在他的侮辱當中，他仍然犯了一件大錯誤。但他很榮耀地告訴我們：他是看不起一切的。我却相信，他的讀者當中一定有些人沒有他那般傲慢。

在這無證據，無審查或無誠意（由他選一樣罷）的論斷面前，人們對於他的擁護莫斯科不祥的黨獄之判決，是不以爲怪的了。彼爾·西志先生自誇「不曉得甚麼叫做難爲情的」；而他也證明了這個。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

我的親愛的格賢諾：

在二月十三日人道報上，讀到安得烈·吳謨則致你的信，我有如下幾點意見：

吳謨則在那封信開頭上引了你的論文中幾句話，這論文名為『無益之死』，是你爲最近莫斯科黨獄而寫的。你在裏面說：『至於我們，則我們不願做史大林主義者，也不願做托洛斯基主義者，這純粹是屬於俄國的事情。』請允許我不同意於你的意見。你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樣遲早總要表示態度的。但我以爲人們可以不贊成史大林，却不因此立刻變成托洛斯基主義者。

以後吳謨則又從我的從蘇聯歸來中摘錄了幾句話：『一個國家單獨的錯誤也決不會敗壞一種國際的大同的事業之真理。』我寫這幾句話，絕非如吳謨則所欲證明的，是反對革命事業；恰好相反，這是爲着救護革命利益，當史大林底蘇聯放棄了這些利益時候，——這點現在我更加覺得有事實證明了，這點，凡有誠意而不肯更長久讓人蒙蔽眼睛的人也一定要承認的。我相信（而且必須堅持這一點）：現在將革命事業和蘇聯連繫在一起乃是極端危險的事；我再說一遍：蘇聯是在敗壞革命

事業的。

正因為揭破了這個敗壞，托洛斯基才被人視為公敵（其實他不過是敵對史大林底敗壞革命罷了），且因之被人當做法西斯的，——這的確是太簡單了。其實他比史大林自身更加是法西斯底敵人，他正是以革命者和反法西斯者底資格來揭破史大林底敗壞革命的。可是你試拿這點向那被人蒙蔽眼睛的民衆說明白罷！

我也不能贊成你這幾句話：「似乎不能懷疑被告之犯罪。……這些人是有罪的。」倘若這話是合乎事實了，則無論這死刑執行如何使我厭惡，我仍是要說：史大林消滅他們是對的。但所有這些親供底真實價值，在我看來，是最成問題的。我請你讀克列伯·列格這封信，關於那些指導西伯利亞卡美洛伏地方礦山工作的工程師和技工，被告怠工而受判罪的。他們也是「供認」了，而且互相控告，雖然所有在他們手下做工的工人和所有派去勘驗地方的技士都證明他們無罪。

惡現象是如此深刻，使人遲疑不敢去認識。這是果子中心生蟲，而果子皮面則是很好看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在馬德鄰巴志

我很注意很熱烈讀過你的文章，關於辯護莫斯科法庭所判決的人，尤其是此時正在受審判的人。理由如下：

我剛從俄國回來，你知道的；在我們考察過程中，我們會同很熟悉本案的人談了幾次話。

此時受審的被告中，有二個人，當我們在俄國時候會聽人說起的。

這是兩個副人民委員，一個屬於重工業委員會的，一個屬於農業委員會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早晨，我們的翻譯斯默林同志，到火車上我們的房間來，

告訴我們如下的話：

「法國同志們，我要讀一張起訴書給你們聽，登在真理報上，那是控告在西伯利亞卡美洛伏地方指導礦山工作的工程師和技士犯怠工罪的。他們於一九三五——三六年間在其指導下的礦井內積聚炭瓦斯，使之不斷地爆發。所有被告在審問時候都承認他們的罪，互相控告，而且說他們爲此工作與兩位副人民委員發生關係。」

第二天早晨到沙克提時候，我們聽說八個被告被判死刑了，當時心裏很驚訝。

我們那時是五個人：維痕，法國礦工全國聯合會書記；西諾、卡讓礦工工會書記；卜蘭克，魏默斯礦工代表；季納，共產黨國會議員。我們同聽翻譯斯默林讀報和解釋。

我還清楚記得，我的朋友維痕，氣憤起來，向斯默林呼喊說：「奇怪得很，你們的被告都自承而且互相控告那些最不可相信的事情！」

我們沒有相信而且永不相信所控告之罪，我們也對斯默林說了。原因如下：

人們（工會負責人）切實告訴我們：有一種最嚴密的檢查機關存在，保護礦山安全。

這機關由如下人員組織之：

- 一、工程師一人，由人民委員會選任；
- 二、地方工會主席數人，由工人自己選任；
- 三、礦井代表及礦區代表數人，亦由工人自己選任。

這些代表似乎有完全權力。他們可以停止一個礦穴，一個礦區或一個工場底工作，倘若認為那裏有危險或僅有危險可能性的話。

我們不明白既然有這樣的檢查機關存在，那些工程師怎能安穩穩準備下這種罪過呢，而且在二二年間長久？



我是礦工，我完全熟悉礦山工作底困難，我做了三十年以上這個工作，其中十二年充當代表，在負責工人安全的檢查機關，在法國最多炭瓦斯的一個礦穴內；我不相信無論如何精明的技士，能夠有系統地準備使礦穴爆炸而不為勞動安全檢查員所覺察，——即令這些檢查員是最愚蠢的。

若是卡美洛伏礦山安全檢查機關沒有覺察到那事情，那這機關不是同謀便是不存在的。

牠若是存在的，則牠比其他被告更加有罪；既然莫斯科流行的是槍斃方法，則牠第一個應當槍斃。

牠若是不存在的，則人們關於保護工人安全的話就是欺騙我們。在此情形下，那些當權的人對於如此重大問題也來欺騙他們邀來的賓客，人們為甚麼還能容忍呢？

即使安全檢查機關是不存在的，我仍舊要說：存心使礦穴爆炸而不為人所

覺察是不可能的。

有工頭，有監督，有幾千工人在礦內工作，他們一定看得出來。

那些知道自己生命有危險的人，難道會默而不言，祇爲得更加確定搜集被告犯罪證據麼？——倘若有此危險，則他們隨時都可以喪命的。

不，從技術觀點看，所有的人都認爲：以積聚炭瓦斯方法使礦穴常處於爆炸狀態，是不可能的事。

最不熟悉礦山情形的人，也會同我們一起呼喊：無論如何不能叫我們相信這個可能性。

還有另一件事情使我們難解：斯默林告訴我們，卡美洛伏托辣斯經理，一九二八年那次有名的沙克提礦山五十三個工程師被控案中——有十一個判處死刑——曾被同一個檢察官起訴過。當年他被赦免了。知道他能夠自願地使千萬人生命於危險，以後蘇維埃政府又安插他在礦山托辣斯經理的位置！人們對

此有何感想呢？

他在卡美洛伏又幹這把戲，同德國工程師雪克靈在一起，他又被赦免了。

這是可能的麼？

人們顫慄着想起了這件事也許是可能的。人們自問：爲這個不祥的滑稽戲要付多少代價。

讀過了你的文章，關於蘇聯幾次獄黨的，我今寫這些東西給你，我要說你做得對的，爲真理利益而大聲疾呼，而且繼續大聲疾呼。

我願這類案件，每次都有獨立的辯護人參加，替那些不幸的人說話，他們受人控告，受人槍斃，而輿論不大明白爲的是甚麼。

我允許你利用我這封信去支持你的努力，爲了人們所審判而太輕易槍斃的那些同志。

倘若你懷疑我的報告，那請你去問我的旅行同伴維痕，西諾和卜蘭格，他

們一定會肯定我所寫的。

我不說起第五個旅伴，他不能反對目前當權的那些莫斯科偶像，這些偶像也許明天也要被人槍斃的。

因爲，誰曉得呢，照這情形下去，俄國革命底最優秀分子不會自相殘殺同歸於盡！

同志，請你接受我的最好的工會的敬禮。

克列伯·列格

全國礦工聯合會副書記

(發表於二月二十五日工會報)

克列伯·列格宣言(發表於巴德加勒啓明報，轉載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二十日時報)

我寫過這話，說俄國婦女所做的一類工作，在我看來，毫不是我們在法國所要的社會主義的。我不怕有人來否認俄國婦女專從事於這類工作。

好像是我說謊，好像我在譏諷俄國革命。

在卡爾文，雖然我起初拒絕，人們仍迫我說出我所見的。我說過的話原文如下：

『俄國工人現在地位，比起革命以前進步得多。』

我說過，俄國礦山工作方法——我曾舉出兩例，并加以稱讚——我們的礦工是不肯接受的，因為我們有更好的，有最好的方法。於是我又被告譏諷俄國革命和信口胡說了。我們生活在這個愁慘的時代，真話遭人唾罵，謊言則受人尊崇。各地礦工中共產黨同志都起來抗議我所說的真話。是一個口令麼？我公開說，我開始疑惑這個，而這絕不會使我驚訝的，因為在某些方面，人們并不忘記我在工會組織中佔據一個負責任的位置。

是的，人們在俄國做了些好的事情；是的，人們改善了工人階級底生活；是的，人們在那裏建設俄國式社會主義；不，法國工人，在其勞動，安全，生活，自由及文化條件，並不遜於俄國工人，恰好相反，是好些，我要說：好得多。

戴尼業醫士用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

先生：

高爾基下葬那日我正在莫斯科，我聽到了你的演說，我很難過，因為我知道你是誠實的，我害怕你在此居留期間祇成了一種長久的騙局。我剛讀了從蘇聯歸來，於是鬆了一口氣。我到俄國去研究某些生物物理學問題，我自由地同那邊同道們生活在一起，沒有官廳和翻譯底干預，我同他們心心相印，——而我感覺痛苦了。你說得很好：非附和主義者是被排出生活之外的。我的所有的

同道，那些「肚子內有汁」的，都將思想和著作隱藏起來，一舉一動也須不斷地受抑制。我的有自由意見的朋友，有些是醫生，有些是著名教授，都被迫而有兩種人格：外的，人家看得見的，說話的，表示的；其他的，則他們深藏起來，非過幾天親密的生活之後不肯顯示於人。

請接受我的敬禮。

戴尼葉

摘錄一九三六年十月在醫科大學的一篇演說

在蘇聯誰能做醫生呢？工作後來隨班聽講的工人或每月領一百十個盧布的学生。他們住在十盧布至十五盧布租金的房子內。

人家隨着考試成績如何或增或減他們的津貼。大學畢業之後，他們被派到鄉村去，當醫生助手或看護。現在大約有十萬個醫生，此時需要有四十萬個。

直到兩年以前，醫生每月祇能收入一百十個盧布，這個數目是不夠的，所以有些醫生寧願去做技術工人，收入可以比較多些。那時要找人做醫生是很困難的，婦女尤佔多數。於是人們看到，醫生在計劃中雖然沒有出息，却是國家所需要的，遂增加工資為四百盧布。以後人們又提高研究的程度，醫生助手底程度。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各年畢業的醫生，知識都不夠；他們被迫回大學來補習六個月。

……這個工作時間好像是很有利的，但我剛才所說的乃是理論，因為做了六個鐘頭的人是很罕有的。普通工資不過四百盧布，不夠生活，一個醫生做兩種或三種職務，為的能得八百至一千二百盧布，因為必須注意到盧布底購買



力：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值八百盧布；好的鞋子，二百至三百盧布；一公斤麵包，一盧布九十；一公尺布一百盧布；此外直至一九三六年，每年必須拿一個月工資去購買公債；醫生和他的家庭共住的一間房子，同時做飯廳，寢室，書齋，廚房等等用的，每月須繳五十盧布租金。他若沒有小孩，還是幸福的。

那邊同道們底物質條件是很困苦的，但最難忍的還是精神上的壓迫。他要留心他的看門人，那是格別烏底密探，他不能將他整個思想告訴他的醫院同事。大戰時，我們法國張貼的標語：「莫做聲，你要當心，敵人底耳朵在聽你們！」在那邊是實實在在的情形。

……某同道，科學學院會員，剛坐了兩年牢；人們對外國人說：他生病了。另一位被剝奪了講座和實驗室，因為他曾發表一種科學意見，不合於共產

主義理論的，他被迫寫一張公開的悔過書，同伽里略一樣，爲的免被充軍。爲甚麼我沒有看見那位我應會面的有自由意見的同道呢？我的電報直到我過後一個月才到他手；我去看他時候，人家對我說他不在，其實他在着。

在巴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先生：

當我在索起瞥見你時，我很害怕你受了欺騙，一種黨派精神——進步之最可怕的敵人——會使你去讚美蘇聯新政；所以你的從蘇聯歸來給了我一種真正的快樂。

我很能說俄國話，我親眼看到，親耳聽到你所見所聞的事情，我完全承認你所說的，而且感謝你敢於說出來。

爲表示我的微不足道的謝意，請你允許我寄給你我在那邊所得的若干感想。

望上帝保佑我們法國能均衡而明達地走牠的新路！

這是第三次，隔了三年時間，我又到俄國來。

由於低層及其野蠻性底侵佔，這制度一開始就讓藝術，文化，感情受人踐踏。

這是蠻族侵略之近代形式。

革命之後二十年了，仍舊有二等車和三等車。在最近建築的一隻俄國大輪船上，旅客之比例：三等佔百分之七五，二等佔百分之二〇，頭等佔百分之五。飲食，衣服，旅館，也是這樣。能付錢的人，就享受最好的位置。

工人每六日中有五日共做四十鐘頭工作，一年之中有五個休假日，正式每年比法國工人多做四百個鐘頭工作，法國工人每星期做四十個鐘頭。但工資是

如此之少，迫得工人每天做一天半或兩天的工作，即在兩個不同的地方做十二個鐘頭至十六個鐘頭的工作。

計件工作制比前更加盛行。有能力做此工作的人所得比同夥更多，同夥因為較不靈巧而欣羨他。

沒有工作可做時候，工人便閒着，而且拿不到工資。國家是沒有感情的，有工作就交給工人做，工人應當做得快而且好，沒有工作就讓工人自尋出路，做別的事情，免致餓死。

小氣，嫉妬，到處仍是一樣的。小心伶俐的工人叫做「烏達尼克」，賺得比夥伴更多，他們的不扣工資的假期可以達到一個月，他人祇有兩星期。

努力的人一般是受人抬舉，得到報償，但優遇親信風氣仍是盛行的，有好多微賤的有本事的人，離中樞日光遠的，則仍完全不為人所知。

有些狡猾的，野心的，很聰明的，或有親戚奧援的，則能夠造成享有非分

特權的地位。每月工資在一百五十盧布至五千盧布中間。有些人比這還少得多，有些人比這還多得多。

做了二十五年手藝工作之後，到六十五歲，工人每月可得三十七盧布養老金。

那些以前不能或不知儲蓄的人，此時不願成爲兒女底負擔，就繼續做工：這樣的人佔最大多數。

國家復興期間，造成一種努力，可以同我們戰後情形相比；但努力，尤其在俄國，并不一定含有舒適或富足之意。

額外鐘點到處都有，因爲一切貨物是貴到令人難以相信。

至於大小工頭，則他們奉到命令，於指定時間內做完某種工作。底下的工人或雇員若努力不夠，則剩餘工作應歸工頭包辦，他們必要時每日須做十八個鐘頭工作，因爲他們負有工人待遇及工作成績之全責的。

這不是容易的事情，他們的夾在中央政權和工人疏忽中間之地位有時是很難應付的。

經過三次預先警告之後，任何工人都可隨時開除，無須賠償損失，亦不用先期關照。

我參觀過的一個工廠內，有一張布告通知工人：從九月一日起，凡不能生產規定的件數者，將毫不通融地被開除。

大小工頭雖然多做了工，他們的工資仍是照舊。但他們可以希望得到雙倍的休假期間以及一種獎勵金。這是常有的，但這不是國家底應盡之職，而是隨人高興的。

國家財政困難時就增加捐稅，那是用扣除工資方法直接徵收而不能規避的，或者強迫購買公債，也是用那個方法。

為賠補一般費用，國家就抬高貨價。最普通的綢緞，一公尺賣一百六十五

佛郎。對於這個新發的商人，虛費財富者，則沒有人敢抱怨一聲。

八月八日政府頒布一個命令，說要扣除工資以援助西班牙之反法西斯鬥爭。這是國家底權利。沒有人敢說話。至於個人預算上有虧空，則無人來過問的。

反一方面，國家設立學校，工廠，醫院，托兒所，療養院，非常美好的休息機關，爲某些工人休假時之用。國家以死刑或充軍嚴厲禁止盜竊和犯罪，維持風化，鼓勵生育，到處取締賣淫，普及教育至於前所未知程度，俄國人民現在有百分之八〇穿鞋子，而帝制時代則有百分之八〇赤足的。

出版自由却是完全禁止了。普通刑事案件在報紙上得不到地位登載。反之，政治案件之審判則連篇累牘，而且登了好多日，公衆意見是隨人操縱的。

政府偉人，航空家，科學家，政治家，一點點事業，能佔報紙篇幅幾星期之久。這是一種催眠術，史大林是他們的神。

羣衆所得利益足夠補償一九一七年流血辛苦麼？雖然有好多進步，到處可

看見很好的努力，但造成了甚麼真實的平等呢？

到處已有新的差等，代替舊的差等了。這種代替一步一步來的，沒有停息，正如這一波浪代替那一波浪那樣的勢所必至的。

我敢打賭，不到十年，所有舊時社會差異都將重新出現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

親愛的紀德先生：

我剛才讀完了從蘇聯歸來。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基洛夫暗殺案發生之後，在大壓迫底印象底下，從那邊歸來的。自從歸來以後，我都留心關於蘇維埃俄羅斯的一切新消息。幾星期前讀過維多·梭奇致你的信，讀過伊雅楚·西倫在莫斯科的信，現在又讀着你的書，我是幸福的，雖然一面心裏難過。我是幸福的，因為你的書又一次給我證明了那條我認為做生命意識基礎的根本原



則，卽：真理祇有一個。我本是共產主義戰士，蘇維埃公務員，在蘇聯做了三年以上工作，在出版方面，在宣傳機關方面，在工廠檢查方面，——我經過了嚴酷的內部鬥爭，經過了有生以來最猛烈的衝突以後，終於得到與你相同的結論，你却是出身於另一個國家，另一個環境的；同我們在一起，還有維多·綏奇哩，還有西侖哩，還有這部分人類不肯接受你書中所說的那個『附和主義』哩。

我的關於蘇聯的著作也許能使你感到興趣。我連這信寄給你我的小書『歐洲之再發現和我的小冊子莫斯科黨獄。他方面，我請出版我的書的楚里希『瑞士之鐘』書店寄給我我的大書，一年之前出版的：『與蘇維埃俄羅斯告別』。

請允許我問你一個問題，這問題不斷地纏住我。這是你的書底末段：『蘇聯發生可悲歎之事，有使革命事業負責之危險。這危險我認爲是很大的，因爲蘇維埃宣傳機關沒有你所要求的那種勇氣來停止玩弄字眼（見第六十七頁），

來承認：「革命精神已不合時宜」。但因缺少這種態度，好多誠實的革命分子仍繼續將蘇聯和社會主義，將史大林政策和一種更合理的社會制度之基礎混爲一談。這個錯誤，我應當說，將麻痺了，將摧毀了人類進步底最好的力量。怎麼辦才能幫助避免這悲慘的結果呢？

，我不知道你的態度如何，關於最近季諾維埃夫——卡門涅夫案件，關於大批的槍決，關於整千整萬『反革命分子』關在白海，西伯利亞和土耳其斯坦集中營裏的問題。那裏除了俄國同志之外，還關着外國同志，還關着『自衛團』分子，他們兩年之前在奧塔克冷防禦物上爲更好的未來時代而奮鬥；那裏關着一些曾在彼得保羅砲壘內尼瓦河水面下坐牢的人。在蘇維埃監獄中有成奇謬三，她的丈夫（何等有意義而可悲痛的巧合！）死在希特勒底集中營內。那裏關着——也許已經死了，也許是活着的死屍——不僅我的好多的朋友，而且好多的革命家，各派社會黨和共產黨，各派進步的分子都知名的。

但輿論，『人道意識』，似乎已不存在了。這次覆演莫斯科黨獄的悲劇，諾伏西伯斯克黨獄，得到何等微弱的應聲！六個人被槍斃了，經過二個鐘頭審判，沒有其他的證人，祇憑被告口供做證據。

死了的人，救不活來。但人們可以阻止其他的人如此死去，可以使那些還在冰海濱，西伯利亞無限荒原上，格別烏有名地窖中，有一絲氣息的人活轉來。

至於我，我是盡我的力量奮鬥的。但我的力量有限，我的呼號祇能達到少數人耳朵，不能夠衝破監獄底牆壁。

但是你，人家認識你。那些假借人類最偉大觀念之名來行此悲慘罪過的人，一定不敢漠視你發出的呼聲的。

人家將奧謝茨基，希特勒壓迫下的犧牲者，解救出來了。

請你幫助解救史大林壓迫下的犧牲者罷！

允許我握你的手。

魯索爾夫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

先生：

我剛帶着感激的心情讀完了你在星期五上發表的著作，現在冒昧寫信給你。你是應得那些人感謝的，在他們看來，革命首先就是社會正義和一切人類底尊嚴。我知道，作家們涉足於這未知世界（革命乃是他們未知的世界），是如何難於敢繼續注視真理，敢高聲宣布他們所見的真理。但我也知道，『要始終一貫堅持自己的意見』這個志願祇靠完全誠實，才能真正滿足的。這種誠實，紀德先生，決不會妨害工人事業的，能妨害的是那些審慎，那些姑息。

我重讀你的著作，我想無疑你現在明白了那些人感到何等的痛苦，他們自

始就擁護十月革命，他們感激十月革命，因為牠是他們的反戰鬥爭之繼續，他們把所有的能力貢獻給牠，他們又看見牠漸漸地（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從列寧死後就開始了）受了舊世界底傳染，而且爲圖久長之故，也許敗壞了牠的真正的存在理由……

馬色爾·馬丁納

在巴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可否批評蘇聯？——對這問題，我回答：可以的。

應當分析俄國革命經驗，必要時批評牠，——列寧曾經這樣要求過他國的共產主義者。但是在甚麼時候呢？一個共產主義者不能拒絕分析現實，拒絕就是否認馬克思主義了。共產主義者正因爲是代表工人運動底未來，所以沒有權利藉口怕無產階級灰心，而將一種革命經驗之錯誤掩藏起來。恰好相反，他

們的義務，他們的職任，正在於分析俄國革命所遵循的道路；尤其在法國，工人階級底政治成熟，使得工人們可以明瞭是人家做錯了，而不是人家有意欺騙他們。這個分析將證明社會主義並沒有實現於蘇聯，但也將顯示俄國革命鬥爭，成績及其條件，對於無產階級未來鬥爭是極可寶貴的教訓和鼓勵。這種態度并非替資產階級變把戲，乃是使無產階級意識明瞭，使牠的鬥爭革命性質加強，同時消除危險的幻想并防止虛誇的樂觀。

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比較起來，蘇聯經濟代表一種巨大的進步。但不應當忽略了其中含有資本主義萌芽。自由市場和差異工資及因之而起的一切效果。

## 紀德答愛倫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巴黎的一種週刊：La France (簡)

上，載有安得烈·紀德答覆蘇聯名作家衣利亞·愛倫堡對他攻擊的一個聲明；因其內容相當有趣，我們將牠譯出，附在紀德答客難的後面。

面。——譯者)

十一月三日的蘇聯新聞報上，載有衣利亞·愛倫堡的一篇文章，上面記着十一月一日的日子，波爾多的地名。一位懂俄文的朋友，替我翻譯出下面這一段：

「恐怖開始了。我見一個礦工，在十月二十二日那一天，打吉莊逃出來，這時吉莊業已被法西斯軍隊佔領了。他告訴我說：在頭一個晚上，法西斯們在勞倫佐廣場上槍斃了一百八十名工人，十六個婦女。這還不過是開始罷了，所有的民軍，成萬的阿斯吐拉人，都有死的危險。

「這兒，我一定要表示我爲有一個人所感受到的羞恥。正當法西斯們槍殺阿斯吐拉婦女的那一天，在法國的刊物上登載着一則反對非正義的『抗議』。這抗議有以下一些作家的簽名：安德烈·紀德，杜哈美爾，羅哲·馬丁·杜·喀特，毛略克，與保羅·立威教授。不過這班人所抗議的並不是阿斯吐拉的屠夫，不是他們自己的政府，這政府對於阿斯吐拉瀕死的人們，拒放一汽輪，一渡船，甚至一小艇以濟之的。不是，這班軟心腸作家們所抗議的卻是西班牙共和國的政府，因爲牠敢於逮捕法西斯黨徒與馬克思主義聯合黨的挑撥離間者。我且不談毛略克，他是一個天主教徒，一位具有右派觀點的人。但他對於法西斯黨人在巴士克所實行的殘暴行爲，在右派報紙上，曾勇敢地高呼他反對的聲浪。但在我們的眼前卻見有安德烈·紀德，他高舉了拳頭，對成千個天真的工人嗤笑。我聽得了他的聲音。（一年前他對我說過。）『我老是想到了西班牙共和派的人；這使我覺醒。』不過這是叫人討厭而且可憐的。無論如何，這些自由思想的杜哈美爾們，與那『極端共產主義者』紀德之流，總



這是與他們的階級一體的。統治階級固然也逼害他們，污損他們。而他們在有時，也會克服了自己的懦怯，舉起他們的小拳；但他們之所以要這樣辦，祇爲了在日後可以用他們那人道主義的僞裝，再度匍伏於屠夫的足下。昨天，在阿斯吐拉屠夫們的機關報 Diano de Navarra 上轉載着這位摩洛哥兵與黑衫軍的新同伴，這個惡毒的老人，這個黑良心的叛徒，這個莫斯科的啞泣者——安得列·紀德的「抗議」。」

從法西斯營壘中出來的侮辱，我認爲是一種榮耀。至於那過去同志所給我的侮辱（尤其是約瑞·盤加朋的），開始使我極其痛苦。但當這些侮辱超過了某種無恥的程度時，我也就無動於中了。這些侮辱改變不了我的感情，也不能使我成爲那些侮辱我的人們之敵人，這難道還需說明麼？每當恐怖橫行之時，人們常能有權假定：人之所以要侮辱人，爲的要保護他自己，那末這些侮辱自然失却了一切價值。

愛倫堡因見我對於「摩洛哥兵」的棄絕正義，殘暴與慘酷，對於佛朗可營中更甚的暴行，不表反對，卻向共和派方面提出抗議，所以驚駭，憤怒。這是真的：雖

然我對於這些暴行，懷着多麼深刻與悲痛的憤慨，可是我總覺得：像我這個與佛朗可誓不兩立的敵人，向他提出呈文，那是沒有用的；佛朗可方面所發生的非正義的事情，祇能使我心硬，可是在我們這方面如果也發生了這種事情，那就叫我心痛。我之參加於反法西斯的事業，因為是太澈底了，所以一切能污損我眼睛的事物，都能忍受而無怨。惟在實行上，假使我們這方面也應用那爲我們所深惡痛疾的法西斯式的行動，我認爲是最有害的，我們不得不表示抗議。愛倫堡所說及的『抗議』，乃當馬克思主義聯合黨領袖被審判的時候，杜哈美爾，毛略克，羅哲·馬丁·杜喀特，保羅·立威與我向西班牙的共和國政府提出的，請求立即尊重被告們的辯護權。抗議表示我們對那政府存着尊敬。這樣的一種文件，我個人是從不會夢想過可以送致佛朗可的。不過現在，最真實的感情，已被報章雜誌變曲到這種程度，卽：那些因熱愛共和國與無產階級事業，而不願牠受到污損的人們，卻被稱爲共和國與無產者解放事業的敵人了。

---

有 所 權 版

---

難客答來歸聯蘇從的我爲

角四幣國價實

館 書 圖 東 亞      所 行 發  
號六弄五七四路卿洽虞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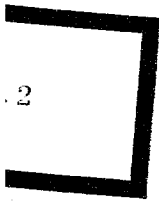
理 代 社 書 益 求      部 市 門  
號五七三路馬四海上

店 書 大 各 省 各      處 售 分

---

版 出 月 六 年 七 廿 國 民 華 中

7



2